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 王玉堂 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遵循
魏志达 十月革命后列宁关于执政党廉政风险的文化透视
程路等 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内容框架、执行偏差与优化路径
徐小满 建设江淮粮仓合肥示范区路径研究

2025年第3期（总第113期）
第24卷 双月刊 5月30日出版

征稿启事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是中共合肥市委主管，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合肥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本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注改革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围绕省情、市情选稿组稿，大力开展政策研究、市情研究、咨政研究和理论宣传，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特征、地域特点、党校特色的理论宣传平台。

本刊于2003年入编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进入CNKI中心网站。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为进一步提高本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将本刊打造成为“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的学术名片和重要窗口”，现向社会公开征稿，热诚欢迎广大社科工作者惠赐佳作。

投稿须知：

1. 稿件应当主题突出、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本刊特别欢迎关于“安徽省情、合肥市情”方面的研究报告。
2. 稿件字数以4000—10000字为宜。
3. 将正文以附件形式发过来，并将单位名称、详细地址、邮编、电话、电邮、摘要、关键词（3—5个）、来稿日期、作者简介（出生日期、民族、职称职务、学历学位、研究方向等）放在正文标题下。
4. 参考文献、注释等放在文尾，勿用脚注或夹注。注释是作者对题名、标题或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须放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之前，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①、②、③……。参考文献是作者写论文时所用引文的出处或参阅的各种书刊资料，须集中列在论文的文末，参考文献序号标注：[1]、[2]、[3]……
5. 来稿文责自负，在不改变文章主要观点的前提下本刊编辑部有权对文章作适当修改，若作者不同意修改请在来稿时作特别说明。
6. 本刊已被“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等收录，如作者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在网站或光盘上同时刊出。
7. 请勿一稿多投。本刊的选稿周期为3个月，3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请作者自留底稿，来稿一律不退。
8. 本刊选稿以质量为唯一标准，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寄送2本样刊。
9. 本刊目前并无网上投稿平台，也未委托任何组织或个人代为征稿。一些打着本刊所谓“官网”名义的网上投稿、征稿平台，骗取作者审稿费、发表费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均属非法行为。请投稿作者切勿上当受骗。

本刊样刊浏览网址：<http://hfdx.hfzhi.com/>

本刊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230031

联系电话：（0551）62206658 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2025 年第 3 期

(总第 113 期)

双月刊

主管单位：中共合肥市委

主办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出版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陈得良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俊 王辉龙 王良仲 王 义 王 玉 王智源 江 飞

江 浩 刘玉勉 孙维红 陈得良 何永义 李安福 李敏琪

李宗开 范观兵 金 玥 周良金 胡爱敏 胡厚翠 凌德政

陶晓娟 黄传霞 程千宜 瞿晓陆

主 编：马 俊

编 辑：黄宁平

朱少家

徐书琴

理论视野

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遵循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王玉堂(3)

十月革命后列宁关于执政党廉政风险的文化透视……………魏志达(11)

策论园地

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内容框架、执行偏差与优化路径

——以 A 省为例……………程路 邓祺 赵妮(21)

建设江淮粮仓合肥示范区路径研究……………徐小满(30)

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本刊合作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发 行:《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通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62206658;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4-500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4-1249/Z

学思札记

陈云的学习观及其现实启示.....申颖洁 花勇(36)

华中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过程中的干部调配问题研究(1942—1943年)

.....李格 黄志高(44)

雨花英烈精神引领大学生志愿服务的路径探索.....吴星星(49)

信息荟萃

“创新安徽,何以进阶?”等六则.....(53)

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遵循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

王玉堂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 淄博 255049)

[摘要]《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集中收录了二〇一二年十一月至二〇二五年二月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总结了党的作风建设经验,深刻揭示了党的作风建设规律,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作风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和执政地位、损害党的形象和公信力、影响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必须时刻绷紧作风之弦,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紧紧依靠人民的监督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紧紧依靠人民的支持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紧紧依靠人民的拥护实现长期执政。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保持常抓的韧劲、细抓的认真、长抓的耐心,持续加强党性锤炼,注重发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表率作用,深化标本兼治,弘扬优良传统,强化制度保障。

[关键词]《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 党的作风 作风建设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集中收录了二〇一二年十一月至二〇二五年二月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总结了党的作风建设经验,深刻揭示了党的作风建设规律,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为什么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170]等一系列

重大问题,立意高远、内涵丰富、系统完备,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作风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作风建设理论,为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学为知之始,“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朱子语类·大学一·经上》)。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加

收稿日期:2025-05-19

作者简介:王玉堂,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

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是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重要任务、重要内容，对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持续好起来，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开篇就是“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为什么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出的科学回答，标志着我们党对作风问题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1]3} 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1]4}。因此，党的作风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抓紧不能放松，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掉以轻心。

（一）作风问题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和执政地位。作风凝聚民心，作风汇聚力量。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正是以优良的作风赢得人民信任和拥护，进而汇聚起磅礴之力推动着历史进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2]2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34}“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44}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最深

厚的根基。作风具有凝聚力，作风实则人心聚，抓作风就是聚民心、固根基，“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1]5}。领导干部作风不过关、不过硬，党风社会风气就不可能好。作风不正必然导致人心涣散。对作风问题如果视而不见、放任不管，就会愈演愈烈，“就会像一把无情的刀割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83}，从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和执政地位。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时刻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以作风之实筑牢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

（二）作风问题损害党的形象和公信力。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彰显党的公信力。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正是以优良的作风展示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崇高形象和“言必信、行必果”的公信力，进而实现了“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3]40}。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们认为习以为常的一些作风问题，往往就是对党的公信力、党的形象带来致命破坏的问题。”^{[1]58} 人民群众观察、评价一个政党，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党的作风。作风建设也是党的形象建设，抓作风就是树形象、提升公信力。党的作风好，形象就好，就有公信力，就能说话有人听、号召有人应，党和人民就能同甘苦、共奋斗。事实上，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应对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也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基业长青、辉煌永续。作风不好，就会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公信力，最终失去民心、失去执政资格。“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褚遂良传》）中外历史上一些政党垮台、政权解体，往往都是从作风败坏开始的。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时刻牢记形象至关重要、形象

就是旗帜,以作风之优展示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特质。

(三) 作风问题影响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作风彰显先进性,作风就是战斗力。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正是以优良的作风保持和发展了自身的先进性、提升了战斗力,进而“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13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和形象关系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13]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有什么样的性质和宗旨,就有什么样的作风。改进作风本身就是从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任务出发进行的一场自我革命,抓作风就是锤炼先进性、提升战斗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党才有生命力和战斗力。一个政党作风不正,是对党的性质和宗旨的背离。一个背离了自身性质和宗旨的政党,自然不会有什么先进性、战斗力可言。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作风松散、纪律松弛的统治集团可以长期处于统治地位。正所谓“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作风松散可以搞垮常胜之师”^[494]。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时刻牢记“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138],以作风之正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本质。

党的作风是党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体现,是党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支撑。世界政党发展的规律表明,一个政党的蜕化甚至变质、变色、变味,往往是从作风不正开始的。作风过硬,才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才能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5210]所以说“巩固政权更不容易”,是因为“越是

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长期执政,党内形形色色的作风问题越是突出”^[14],稍有松懈,一些看似作风上的小问题就会日甚一日地“损害党的威信和形象,侵蚀党的执政根基”^[146],进而演变成危及执政安全的大问题,正所谓“小善渐而大德生,小恶滋而大恣作”(北宋·黄晞:《警隅子·道德》)。因此,作风之弦必须绷得紧而又紧,始终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紧紧依靠人民的监督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紧紧依靠人民的支持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紧紧依靠人民的拥护实现长期执政。

二、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是贯穿《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的一条主线。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党的作风建设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体现了我们党对作风问题不放过的鲜明态度和历史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长期的实践来看,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个永恒的主题。”^[1150]纵观历史,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始终贯穿着党的作风建设,始终坚持把推进党的事业、实现党的使命与改进党的作风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不断适应新形势、取得新成效、开辟新境界。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以优良作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6336],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党一经成立,党的作风问题被提了出来,并由此开始了对作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我们党作风建设的探索与奠基期。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三湾改编”,是我们党进行作风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发展到“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确立了人民军队的纪律基础和作风建设的初步框架，成为我们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进行作风建设具有立柱架梁意义的一项重大举措。后来，叶剑英同志说，“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7]485}。延安整风是我们党进行作风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其间，毛泽东同志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8]812}这是我们党首次提出“党风”的概念。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8]104}。这三大作风，“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8]104}。当年，“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9]52}，就是共产党人优良作风的真实写照。抗日战争期间，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访问重庆和延安后，切身感受了“延安作风”与“西安作风”的巨大反差，他结论性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0]3}由此观之，“延安作风”之所以能够最终打败“西安作风”也就不难理解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1]1438-1439}，饱含着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对自身作风能否适应建设一个新中国要求的深沉忧患意识。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以优良作风鼓起亿万人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为巩固新生政权、经受执政考验提供了有力保障。党的地位的变化，

必然带来党员干部思想作风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11]1438}，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我们党始终保持作风建设上的自觉和坚定。邓小平同志把党的作风与党的领导资格、执政能力联系起来，极有见地地提出，“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12]274}。针对增产节约运动中出现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标志着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通过“三反”运动，不仅纯洁了队伍，教育挽救了大批干部，而且改进了作风，成为党在执政条件下保持清廉、惩治腐败的一场初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有效应对党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对整风运动作出部署，对整风的对象作出了明确界定，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13]1634}，整风的目标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4]543}。这次整风中广大干部群众包括许多有影响的党外人士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大量批评和建议^{[9]192}，对我们党改进作风、改正缺点和错误有很大益处。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以优良作风团结带领人民“杀出一条血路”^{[15]236}，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事物

都处在变化之中，我们党所面临的环境和党的队伍也处在变化之中。”^[116] 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到来，作风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地表现出来。党的作风建设随之被提到“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6]273}的战略高度。这是在作风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当时，我们党的作风面临着恢复过去的优良传统与适应当前的形势任务的巨大考验。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郑重指出：“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17]162} 后来他又告诫说：“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8]314}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强调：“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19]323-324} 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告诫全党：“党的优良作风是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20]322}，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21]169}。这一时期，我们党先后作出《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等一系列重大决定，对党的作风建设作出部署、提出要求；先后开展了整党活动、“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一系列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党的作风、党的形象、党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以作风屏障挡住了市场经济大潮中商品交换原则向党内的渗透，为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以优良作风团结带领人民爬坡过坎、攻坚克难，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1158]。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1170]。党的十九大之后，针对新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修订了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继续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1170]。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央八项规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1170]，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169]。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发出“三个务必”的庄严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141-2] 聚焦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持续部署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今年开展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每次集中教育都贯穿着作风建设要求。大力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紧盯关键节点，深化标本兼治，把刹住“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的重要途径，“对享乐奢靡歪风露头就打，对隐形变异新动向时刻防范，对顶风违纪行为从严查处”^[1173]，推动党的作风持续向好，八项规定改变中国成为新时代作风建设的鲜明标识和壮丽气象。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背后是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严的持续推进、作风建设越抓越紧的

持续加强和由此带来的“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1]59}。

综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央八项规定”,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两个务必”到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三个务必”,从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到今天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在党一百多年的光辉历程中,始终贯穿着作风建设这一鲜明主题,而且越是在重大历史关头,越是牢牢抓住不放,聚焦突出问题,集中全力纠治,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升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提供了坚强保障,“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5]341}。

三、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的收官篇。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实践要求的科学概括,深刻体现党的作风建设规律,充分彰显我们党抓作风建设“一丝都不放松、一刻都不停顿”^{[1]36}的坚定和执着。“风气养成重在日常教化,作风建设贵在常抓不懈。”^{[1]15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作风建设不但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但要抓党风政风,而且要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1]154} 好作风不可能一蹴而就形成,更不可能一劳永逸保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持续抓、持续改、持续深化,在坚持中见常态,在反复抓中防反复。

(一)加强党性锤炼。作风问题的背后是

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体现的是党性,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党性。我们改进作风,不能简单就事论事,以为把眼前存在的作风问题从面上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举一反三,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这是改进作风的一个重要着眼点。”^{[1]17} 党风是由党性决定的,党性强,才能作风正;党性不强,必然导致作风不实。《黄帝内经》中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改进作风,必须持续加强党性锤炼,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不能变心而从俗”(《楚辞·九章·涉江》)的思想根基。党的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风操守的要求”^{[5]269},要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自觉用以滋养初心、引领使命、改进作风。忠实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锤炼党性、转变作风。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作风建设智慧,不断丰厚作风建设的历史文化土壤,不断消除不正之风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自觉加强道德修养,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坚持优良作风、抵制不良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1]159}。

(二)发挥表率作用。党风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其中的主导因素是干部,有什么样的干部队伍就有什么样的党风政风,进而引领形成什么样的社风民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风历来是引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风向标,是人民群众观察党风的重要窗口”^{[1]141},“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

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1]104}。“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宋史·宋祁传》)好作风是抓出来、管出来的,也是领导干部以“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1]105}的坚强党性、自律精神和“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1]38}的为民本色、无私情怀带出来的。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坚持自上而下推动落实、以上率下示范引领、上下联动形成合力。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自身所处的位置、肩负的责任和举足轻重的社会影响力,时时保持警醒,处处当好表率,在践行宗旨、担当使命上敢负重、善作为,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上高标准、严要求,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上倾真情、尽全力,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实践中打头阵、当先锋,以过硬的作风、模范的行动、良好的形象为基层和广大党员、干部立起标杆、做出样子,展现共产党人冲在前、干在前、奋发进取、奋勇争先的先锋队本色。

(三)坚持标本兼治。作风问题具有标和本之分,解决作风问题,既要善于“扬汤止沸”以治标,又要勇于“釜底抽薪”以治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落细落小、到边到底。”^{[1]160}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唐·白居易:《策林一·兴五福销六极》)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作风建设必须着眼常和长,抓住标和本,靶向发力。既要奔着问题去,该纠正的坚决纠正,该禁止的坚决禁止,防止蔓延开来,以治标而正风肃纪;又要对着根源治,在加强修养、提升境界、固本培元上下功夫,以固本而兴利除弊。当前,要聚焦“四风”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持续深化,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什么

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问题,有的放矢,务求实效,并由点到面、由表及里,全面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改进学风、文风、会风,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党内政治生态全面纯净起来。作风问题往往都是事业推进过程中因形势、环境、任务变化而思想观念、制度机制、工作方式不能与之相适应而带来的问题。要把解决突出作风问题与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以改革的办法固化作风建设成果”^{[1]149},为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

(四)弘扬优良传统。好传统重在传承,使之相沿成习;好作风贵在弘扬,使之化风成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要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1]10}党的作风建设具有承袭性,是一个承前启后、接续推进的过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重视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真正“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2]351}。调查研究是改进作风的重要途径,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把调查研究作为工作常态,“在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下功夫,把工作抓实、基础打实、步子迈实,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1]143}。大力“弘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光荣传统,涵养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1]58-59},确保“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12}。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宣传节约

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1]64},让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成为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的重要保证。

(五)强化制度保障。作风建设是作风养成与作风保持的过程,也是坚持和弘扬优良作风、克服和抵制不良作风的过程。形成良好作风不易,将好作风长期保持下去更难,必须发挥制度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作风建设,集中教育整顿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1]51},“没有制度保证,改进作风的成果最后也保不住”^{[1]50}。“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十》)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改进作风,既要靠行为自觉,也要靠制度约束,必须“建立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1]62},向制度建设要长效。要全面梳理现有制度规范,进一步补齐制度建设中的短板弱项。制定制度“要本着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体现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1]57},努力形成系统完备、行得通、真管用的制度体系。“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明·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制定制度易,执行制度难。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以健全的制度体系、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推动作风建设实现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四、结语

新时代新征程,既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伟大远征,也是充满风险和挑战的艰难跋涉^[23]。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

设,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1]11}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重任庄严地落在了当代共产党人的肩上,使命任务神圣而光荣,风险挑战严峻而复杂。战胜风险挑战、完成使命任务需要良好的作风保障,必须结合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进一步“对标党风要求找差距、对表党性要求查根源、对照党纪要求明举措”^{[1]43},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保持常抓的韧劲、细抓的认真、长抓的耐心,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提素质、强本领,以优良作风凝聚党心民心、汇聚智慧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4]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5]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7] 叶剑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8]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下转第20页)

十月革命后列宁关于执政党廉政风险的文化透视

魏志达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廉政风险防控是党和国家在复杂国内外环境下实现自我净化的关键防线,事关长期执政安全、发展大局稳定和民族复兴进程。十月革命后,俄国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变革,但文化层面的变革却异常艰难和漫长。列宁敏锐洞察到,公职人员文化素养不足导致的权力异化、资产阶级官僚文化遗传引发的深层腐败、苏俄民众文化水平低助长的基层腐败等系统性风险,共同构成了俄共(布)廉政风险的深层土壤。因此,研究列宁如何透视这一“文化滞后性”带来的廉政风险,有助于理解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面临的复杂局势和艰巨挑战,同时这与新时代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特别是夯实“不想腐”的思想道德根基的理念高度契合,能够为新时代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培育廉洁价值观提供历史经验和理论支撑。

[关键词]列宁 执政党 廉政风险 文化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1]26}。有效防控廉政风险是保持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核心要求,直接关系到民心向背和执政合法性。“文化问题在列宁的整个理论与实践生涯中占据重要位置,

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基于社会主义实践遭遇到的现实问题,使其进一步意识到文化上的落后与错误文化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构成的深层阻滞力与巨大危害。”^[2]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复杂的廉政风险,列宁立足苏俄具体实际,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深刻剖析其生成机理。列宁揭示出公职人员文化素养不足导致的权力异化、资产阶级官僚文化遗传引发的深

基金项目:2024 年度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化建设研究”(立项编号:FJ2024XZB063)。

收稿日期:2025-05-21

作者简介:魏志达,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层腐败、苏俄民众文化水平低助长的基层腐败等系统性风险,通过解构管理技术缺失、文化领导权倒置等深层文化机理,构建起执政党廉政风险的文化分析框架,从而为无产阶级政权防范廉政风险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因此,通过系统梳理和科学把握十月革命后列宁关于执政党廉政风险思想,从“文化透视”的角度切入,关注列宁对俄共(布)廉政风险产生的思想根源、文化土壤等的分析,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列宁廉政思想的精髓,揭示其廉政建设思想的深层逻辑。

一、公职人员文化素养不足导致的权力异化风险

(一) 管理技术文化的缺失导致了低效行政

在十月革命后的特定历史场域中,列宁对廉政风险的文化透视深刻揭示出,文化素养不足在管理技术层面的集中显现,成为引发行政系统运转低效的关键原因。列宁明确指出,彼时的俄共(布)党员在革命斗争理论方面能够侃侃而谈,却在摆脱极端贫困这一现实治理任务中暴露出根本性的能力短板,“需要深思熟虑,需要有文化,办事能井井有条。这些他们却不会”^{[3]106},这精准指向管理技术文化缺失这一文化素养不足的重要表征。管理技术文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要素,涵盖了对国家事务的专业化认知、规范化操作流程以及系统性统筹能力,而当这一文化素养处于赤字状态时,行政体系的运行便陷入无序与混乱。

列宁以处理最简单的国家事务为例,揭示出管理技术文化缺失导致的低效行政样态,指出“必须采取文明的办法,必须懂得这是国家事务、商业事务,如果有了障碍,就应该善于消除,把对办事拖拉负有罪责的人送交法院”^{[3]106}。但现实却是“无产阶级

法院是知道怎样治罪的,但是要治罪,就要找到罪犯,我敢向你们担保,罪犯是找不到的,你们大家都来看看这件事情,这里没有罪犯,只有混乱和瞎忙”^{[3]106}。这一“混乱和瞎忙”的本质,正是缺乏现代管理技术文化所必需的制度理性与操作规范,使得行政责任无法精准界定,行政流程无法有效运转,最终导致权力运行偏离既定轨道,为廉政风险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更进一步分析,列宁曾指出的两个俄共(布)党员争论究竟何时应该把问题提到政治局去以取得购买食品的原则性指令这一现象,本质上是管理技术文化缺失在决策层面的具象化。当国家治理陷入对原则性指令的程序纠结而忽视了事务处理的实质效率与专业逻辑时,行政系统便沦为脱离实际的空转机器,“一切白卫分子和怠工者就利用这一点”^{[3]106},通过操纵管理、制造混乱来破坏苏俄革命成果。这种因管理技术文化缺失导致的低效行政,不仅造成治理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消解了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基础,使廉政建设面临结构性风险。列宁的论述深刻表明,文化素养不足在管理技术层面的缺失,不仅仅是能力问题,更是关涉权力能否正当行使、制度能否有效运转的根本性文化命题,唯有构建与国家治理相匹配的管理技术文化,才能从文化根基上筑牢廉政风险的防火墙。

(二) 文化领导权倒置导致了反向文化殖民

在十月革命后的权力建构与治理实践中,列宁对文化素养不足的深层剖析,揭示出一种因管理能力匮乏引发的文化领导权倒置现象,这一倒置本质上构成了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反向文化殖民风险。列宁明确指出,尽管“政治权力是完全够了”^{[3]97},同时“主要经济力量操在我们手里”^{[3]97},但“做管

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397],这一论断深刻揭露出文化素养不足在权力运行中的矛盾,即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无产阶级,因文化管理能力的缺失,在实际治理中陷入被领导的尴尬境地。这一文化领导权的倒置,实质是旧有官僚文化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隐性渗透,形成了权力行使中的文化逆殖民状态。

列宁对这一反向文化殖民的分析,超越了简单的权力归属判断,深入到文化领导权的实质运作层面。列宁以历史上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的文化互动为参照,深刻揭示出“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398]的文化领导权规律。这在苏维埃政权语境中转化为独特悖论,即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作为“出征民族”,其管理文化素养却低于作为“被征服者”的旧官僚体系从业者。尽管旧官僚文化水平并不突出,但因俄共(布)党员没有足够的管理本领,反而使苏维埃政权运行被低水平文化所主导,出现“怠工者有时巧妙地故意把他们推到前面当做招牌”^[398]的治理异化。这一文化领导权的倒置,本质上是文化素养不足导致的权力行使空心化,无产阶级虽拥有制度性权力,却在实际治理中被旧文化势力通过专业技能优势、操作流程惯性等隐性机制所支配,形成权力运行的“文化傀儡”现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敏锐洞察到这一反向文化殖民在新经济政策语境中的特殊表现,即“资产阶级人士往往比我们的优秀共产党员懂行,我们党员虽然拥有全部政权和一切条件,但丝毫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政权”^[399]。这一论断中的“懂行”与否,绝非单纯的技术能力差异,而是文化

领导权争夺的具体化,资产阶级凭借其在商业事务、管理流程等领域的文化优势,在新经济政策引发的治理竞赛中形成事实上的文化领导权,而无产阶级因文化素养不足,在处理国家事务、商业事务等时陷入“不善处理”的困境,使权力运行偏离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要求。可见,这一反向文化殖民的深层危害在于,其通过消解无产阶级的文化主体性,使苏维埃政权运行逐渐背离革命初衷。列宁的重要论述表明,文化领导权倒置本质上是文化素养不足在权力关系中的反映,“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摆脱党的领导干部常常被旧官僚‘愚弄’而陷入‘被动执政’泥潭的重要路径”^[40]。唯有破解这一文化赤字难题,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对文化领导权的实质掌控,从根本上阻断反向文化殖民带来的廉政风险。

(三) 制度文化认知鸿沟导致了制度执行与制度原则脱节

在十月革命后的制度建构与治理实践中,列宁对文化素养不足的深刻洞察,揭示出因制度文化认知鸿沟导致的制度执行与制度原则脱节,这一脱节造成了苏维埃政权面临权力异化风险。列宁明确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制度层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方向,“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3382],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制度文化转型中的认知鸿沟,即新制度的原则构想与旧文化的作用惯性之间存在结构性断裂,使制度设计难以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

从教育领域制度的实践可见,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出“在苏俄所有学校中讲授电气化计划”的决定,这是一个体现新制度文化导向的决策,但“这个决定同其他许多决定一样,由于我们(我们布尔什维克)文化落后,始终是一纸空文”^[351]。这一制度

执行的失效,并非源于权力意志的衰减,而是根源于制度文化认知鸿沟。当电气化计划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制度符号被引入苏俄教育体系时,执行者缺乏将制度原则转化为具体教学实践的文化能力,既无学校参考书这类承载制度文化的知识载体,也无工程师、教员小组这类具备专业文化素养的执行主体。对此,列宁强调指出:“做这件事情所必需的正是文化”^{[3]383},这深刻指出制度文化的落地需要与之匹配的认知与操作能力,否则制度执行只能停留在文本层面,沦为“每小时都在宣布,每分钟都在实行,而后又每秒钟都在证明其不扎实、不可靠和未被理解”^{[3]383}的空洞宣言。

在国家机关运行层面,制度文化认知鸿沟表现为“对社会制度中的精华没有仔细考虑,没有充分理解,没有深切感受”^{[3]383}的治理困境。列宁敏锐发现,苏维埃政权虽然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却因文化落后导致制度运行出现不扎实、不可靠和未被理解的脱节现象。这一脱节的本质,是制度文化的落地实施与深层认知的错位:一方面,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缺乏建立优秀机关所必需的文化素养,无法将制度原则内化为专业管理能力;另一方面,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在苏俄严重不足,导致制度执行依赖旧文化惯性下的官僚操作模式。当制度原则停留在政治宣示层面,而执行体系被旧文化逻辑主导时,权力运行必然偏离制度设计的初衷,为官僚主义的无所事事、冒进说大话等异化现象提供滋生土壤。

更为深刻的是,列宁揭示了制度文化认知鸿沟在廉政风险生成中的传导作用,即制度执行与制度原则的脱节,本质上是文化素养不足在制度运行中的具象化。“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几乎有五年了,但旧的资产

阶级学者还在无产阶级的国立学校和大学里用旧的资产阶级破烂教育(确切些说,腐蚀)青年”^{[3]50-51},这一教育领域的文化渗透,实则是制度文化认知鸿沟的外显,新制度的教育原则因缺乏文化载体和执行能力,被资产阶级旧文化的知识体系所消解。同理,国家机关中合格管理者的缺位,使得苏俄制度运行不得不依赖旧有官僚体系的操作惯性,最终导致名义上是社会主义方式,而实际上是旧官僚主义方式的治理异化。列宁的重要论述表明,制度文化认知鸿沟不仅造成治理效能的损耗,更重要的是消解了制度合法性的文化根基,使权力运行在制度执行与制度原则的裂缝中面临被旧文化侵蚀的风险。唯有弥合制度文化的认知鸿沟、使新制度的原则内化为公职人员的文化自觉,才能从根本上阻断因认知鸿沟引发的廉政风险。

二、资产阶级官僚文化遗传引发的深层腐败风险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影响党和国家机关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延误和迟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5]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受资产阶级官僚文化遗传影响,这一官僚文化基因在苏俄的隐性延续,本质上构成了对无产阶级政权性质的侵蚀,使得俄共(布)廉政建设面临严峻挑战。

(一)苏维埃机关“重数量轻质量”的治理误区消解了廉政效能

在苏俄国家机关建设中,列宁对资产阶级官僚文化遗传的深刻批判,揭示出苏维埃政权因袭旧官僚体制而形成的“重数量轻质量”的治理误区,这就造成了官僚文化对廉政效能的消解。列宁通过1918年与1922年莫斯科机关职员数量的对比——从231000人增至243000人,尖锐指出,历次精简的结果竟是机构规模膨胀,而“我们的

机关缺点很多,膨胀了一倍有余,往往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是反对我们”^{[3]251},这一现象实质上是旧官僚体制重视规模扩张积弊的文化遗产。当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制度转型中未能切断旧官僚文化的深层影响,便不自觉地陷入重视人员数量增长而忽视治理能力提升的怪圈,使苏维埃国家机构沦为旧体制积弊滋生的温床。

官僚文化遗传的重要表征在于将“瞎忙”、文牍主义等旧体制积弊转化为苏维埃新政权的运行逻辑。列宁直言:“我们是自发地建立自己的机关的”^{[3]252},这一自发性导致“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待着怠工或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3]252},数量优势被旧官僚的低效陋习所侵蚀,形成“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3]252}的治理困境。当苏维埃机关将人员规模扩张作为应对治理挑战的主要手段,实则延续了旧官僚体系“重数量轻质量”的文化基因,表面上的组织膨胀不仅未能解决“工人的文化水平很低,担负这一全新的业务很困难”^{[3]252}的根本矛盾,反而为怠工、形式主义提供了制度庇护所,使廉政建设陷入“机构越扩、效能越降”的怪圈。

重视数量而轻视质量的治理策略,本质上是官僚文化对无产阶级政权的隐性改造。列宁强调指出:“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3]384}“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才,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3]384-385},这一重要论断直指官僚文化遗传的重要病灶,即苏维埃国家机关建设背离质量优先的现代治理原则,转而依赖旧体制惯用的规模扩张路径,这使廉政效能消解于“五年来已经证明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3]384}瞎忙之中,权力监督与制度约束因机构臃肿而难以落实,为怠工或半怠工的官僚主义行为提供

了滋生空间。

列宁对“七次量,一次裁”^{[3]384}准则的强调,实质上是对官僚文化遗传的有效反击。列宁认识到,旧官僚文化的遗传在于将机构规模视为治理能力的外在表征,却忽视了“真正的精华”^{[3]384}即具备专业素养与革命精神的人才对廉政效能的重要影响。当苏维埃机关陷入“膨胀—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实则是旧官僚文化的“数量崇拜”在苏维埃政权中的延续,这一陋习不仅导致改善苏维埃国家机关的目标被拖延实现,更使廉政建设面临巨大挑战,即庞大的机构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低效的运行掩盖了权力异化的实质,“文牍的汪洋大海”^{[3]252}成为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保护层。列宁的重要论述表明,官僚文化遗传的根本危害,在于通过“重数量轻质量”的误导,消解无产阶级政权赖以维系的廉政效能,唯有打破这一治理误区,建立质量优先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建设原则,才能阻断旧体制积弊对苏维埃政权的侵蚀,从文化基因层面筑牢廉政风险的防线。

(二) 资产阶级学者垄断文化解释权瓦解了无产阶级管理权威

在资产阶级旧体制中固有陋习的渗透下,资产阶级学者对文化解释权的垄断成为瓦解无产阶级管理权威的重要因素。列宁指出:“我们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3]361},这深刻揭示了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地位。在资产阶级旧体制下,资产阶级学者长期占据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其文化解释体系带有浓厚的官僚文化特质,这一特质与苏维埃政权所倡导的文化价值体系存在根本冲突。

资产阶级学者凭借其在文化领域的传统权威，垄断了知识生产与意义阐释的话语权，将符合资本主义旧体制官僚习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嵌入文化传播过程之中。资产阶级学者对文化的垄断使得无产阶级在构建自身管理权威时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如列宁所言，“大多数工人深知自己的——且不说在文化方面，而是在识字方面——不足”^{[3]361}，这种文化上的弱势地位导致无产阶级在管理实践中难以有效输出自身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学者利用文化解释权，将无产阶级政权的建设实践与旧体制的官僚文化相结合，消解了无产阶级管理权威的合法性基础。

对此，列宁强调指出：“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3]382}，这一论断直指资产阶级学者垄断文化解释权所形成的文化惯性。旧体制的官僚文化通过资产阶级学者的文化阐释持续渗透，使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制度构建和管理实践中面临深层腐败风险。这一垄断不仅阻碍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建设进程，更使得官僚文化遗传中的消极因素在苏维埃新体制内得以留存，成为廉政风险的文化根源。当资产阶级学者凭借文化解释权构建起与无产阶级管理权威相抵触的思想文化体系时，苏维埃政权内部的价值共识难以形成，管理权威的统一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进而为腐败提供了文化土壤。列宁对这一问题的深刻剖析，揭示了文化领导权争夺在廉政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凸显了打破资产阶级学者文化垄断、构建无产阶级文化话语权对于防范官僚文化遗传导致腐败风险的重要意义。

（三）制度运行层面旧式层级审批文化削弱了苏维埃制度本质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廉政风险，在制度运行层面集中表现为旧式层级审批文化对苏维埃制度本质的削弱，这一现象本质上是官僚文化遗传在新体制中的隐性延续。列宁以“购买罐头需两次调查、高层干预乃至政治局发指令”的案例为切入点，深刻揭示了旧式层级审批文化对苏俄制度运行的侵蚀，即便拥有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即便建立了全套机关，却因“百分之九十九的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工作人员（我丝毫不反对他们，并且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共产党员）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缺少文化”^{[3]105}，导致看似完备的制度体系在实际运作中被旧体制的官僚主义积弊所侵蚀。

旧式层级审批文化作为官僚文化遗传的重要内容，其危害在于将制度异化为程序空转的外壳。列宁指出，拖拉作风与贪污受贿“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6]208}，这一重要论断直击制度运行的文化深层逻辑。当苏维埃公职人员深陷旧体制的层级审批文化惯性，将审批流程视为权力符号而非服务工具时，制度运行指向的服务人民、高效运行这一本质目标便被层层叠叠的程序所遮蔽。苏维埃制度本应是无产阶级意志的体现，却因官僚文化遗传的影响，在实践中演变为依赖“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干预”^{[3]104}的非常态运作，暴露出制度运行对旧式权威层级的隐性依赖，而非基于文化素养的制度化治理。同时，官僚文化遗传所催生的层级审批崇拜，本质上是对苏维埃制度民主内核的消解。列宁指出，政治教育工作者“一进什么机关就会官僚化”^{[6]208}，警示旧体制的层级思维会通过制度运行的文化惯性渗透到苏维埃政权中。当制度运行依赖自上而下的审批干预而非基于文化自觉的规

则遵循,当执行委员会里贪污受贿成为普遍现象,说明官僚文化遗传已将制度异化为权力博弈的场域而非公共服务的载体。这一文化惯性使得苏维埃制度在形式上保留了层级架构,却在实质上被旧体制的官僚习性削弱了,形成“一切机关都有”^{[3]104}却“不能文明地处理业务”^{[3]105}的制度困境。

可见,列宁对这一问题的剖析,揭示了官僚文化遗传在制度层面的双重侵蚀,其既通过层级审批的繁琐程序消耗制度效能,又通过文化素养的缺失消解制度运行的价值根基。当提高文化水平成为解决拖拉与腐败问题的关键,实则指明了打破旧式层级审批文化惯性、重构苏维埃制度文化基础的必要性。唯有摆脱官僚文化遗传的束缚,使制度运行建立在工作人员的文明素养与文化自觉之上,才能避免苏维埃制度运行被旧体制习性削弱,真正实现无产阶级政权的廉政目标。列宁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文化在制度反腐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理解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廉政风险的生成机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三、苏俄民众文化水平低助长的基层腐败风险

(一) 文盲泛滥使得腐败在基层社会持续滋长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对廉政风险的审视中,深刻揭示了文盲泛滥与基层腐败蔓延之间的内在关联。列宁深刻指出:“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3]360},其发展甚至不及沙皇时代进步缓慢的识字率水平,这一群众性文盲现象绝非单纯的知识匮乏,而是表征着苏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当大量苏俄工农群众处于文盲状态时,既无法通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形成对公共事务的理性认知,也难以构建起对官僚体系的有效监督机制,遑论在

价值层面内生出对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的自觉抵制。

列宁强调指出:“仅仅识字还不够,还要有能教人们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6]208},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文化建设的双重维度,即不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政治伦理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在文盲泛滥的苏俄基层社会,腐败行为之所以能够持续滋长,根本原因在于苏俄工农群众文化水平低使得制度约束缺乏必要的社会文化支撑。基于此,列宁尖锐指出,唯有提升苏俄工农群众文化水平,才能有效治理基层腐败问题,这就揭示了文化因素在廉政建设中的不可替代性,缺乏普遍文化水平提升的基层社会,即便建立了工农检察院等专门的监督机构,也会因工农群众缺乏相应的文化素养而难以形成对腐败的群众性文化抵制。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苏俄文盲泛滥成为基层腐败滋生的深层根源,它既消解了制度运行的文化基础,又瓦解了社会监督的主体能力,更使得腐败行为在缺乏文化批判与价值否定的环境中获得了蔓延的温床。列宁对“政治教育”概念的广义界定,即“意味着实际的结果,意味着教会工农群众怎样取得实际结果”^{[6]209},进一步凸显了文化提升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系统性的文化提升,使工农群众具备“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6]208}的文化素养,“通过提升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增强其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和认同”^[7],才能从根本上构建起抵制腐败的社会文化屏障。可见,列宁对文化水平低与基层腐败关联的理论阐释,不仅超越了单纯制度层面的反腐思路,还从社会文化结构层面揭示了廉政建设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为理解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廉政风险提供了独特的

文化分析框架。

（二）群众文化素养低下使得民主监督机制失效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剖析苏维埃政权廉政风险时,将苏俄工农群众文化素养视为民主监督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变量,深刻揭示了文化水平低与监督失效之间的内在逻辑。列宁明确指出,尽管无产阶级已通过政治革命确立了政权性质,扫除了法律层面阻碍苏俄工农群众参与管理的制度壁垒,但文化水平十分低下的现实,使得“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8]155}。这种由文化落差造成的“管理主体代替”现象,实际上是文化水平低在权力运行中的具象化,“列宁深谙工农检察院人员构成的主体为工农群众”^[9],而当作为监督主体的工农群众因文盲状态或知识匮乏而无法理解公共事务的运行规则、识别官僚主义行为模式时,民主监督机制便因主体能力的缺位而陷入制度空转。对此,列宁进一步强调指出:“官僚已被打倒。剥削者已被铲除。但是文化水平还没有提高,因此官僚们还占据原有的位置”^{[8]155}。这一论断精准勾勒出文化水平低如何为官僚主义留存创造条件,即旧国家机关的运作惯性借由苏俄工农群众文化素养的“洼地”形成信息不对称屏障,使得权力行使者能够规避实质性监督,而监督主体的认知能力不足与监督客体的专业知识优势之间的矛盾,又在客观上纵容了官僚主义的复萌。

从廉政风险防控的维度看,列宁揭示出文化因素对监督机制效能的深层规定性,即民主监督的本质是工农群众对公共权力的直接参与,而这种参与不仅需要政治权

利的法律赋权,更依赖于工农群众文化水平所支撑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与行动能力。当苏俄的文化革命尚未完成,多数农民和工人仍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时,监督主体既无法有效解读政策文本、识别权力滥用迹象,也难以通过组织化渠道表达监督诉求,致使反官僚主义斗争失去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列宁特别指出:“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8]154},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通过长期的教育提升苏俄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这意味着文化提升并非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关涉社会主义政权的人民当家作主能否真正落实的政治命题。

新生苏维埃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却未能同步构建与之匹配的文化基础,使得监督机制因缺乏合格的实践主体而难以发挥作用,进而为官僚主义滋生和腐败蔓延埋下隐患。可见,列宁对文化水平低与廉政风险关联性的深刻洞察,既立足苏俄“文盲国度”的现实,又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权建设中文化基础与制度效能的辩证关系,即没有文化支撑,民主监督只能停留在纲领层面,而廉政风险防控也将因失去群众性文化土壤而沦为空中楼阁。

（三）城乡文化的割裂使得农村成为腐败高发区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审视苏维埃政权廉政风险时,敏锐洞察到城乡文化结构的断裂性特征对农村治理的深层影响,将城乡文化联系的自觉建构视为防控农村腐败的关键路径。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对农村的文化影响具有破坏性,而苏维埃政权虽天然具备向农村输送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但若缺乏“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

性”^{[3]364}的文化联结机制，这一正向影响仍会限于自发状态，难以抵御旧制度遗留的腐败诱因。列宁以西伯利亚西部的实践为例，提出通过城市支部与农村支部的制度化分配联系，构建常态化的文化赋能体系，实则揭示了城乡文化割裂状态下农村作为腐败高发区的内在原因，即当城市先进文化无法有组织地渗透到农村地区，乡村社会便因先进文化的缺失而成为旧文化惯性与官僚主义滋生的温床。

城乡文化割裂首先表现为治理资源的结构性失衡。列宁强调指出：“除了我们的正式预算或正式联系，我们几乎没有为农村做任何事情”^{[3]364}。这一城乡文化联系的缺位，使得农村在脱离旧政权剥削后，仍面临着文化资源匮乏的问题。农民因缺乏城市工人阶级的组织化文化帮扶，既难以理解苏维埃政权的治理规则，也无法有效识别基层权力运行中的异化现象，这在客观上就使基层腐败行为的滋生有了文化土壤。同时，城乡文化互动的自发性导致监督机制在农村地区的虚化。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城市对农村的负面影响具有政治、经济、道德、身体等方面的系统性侵蚀，而苏维埃城市若不能以自觉的文化联系抵消这一历史惯性，农村便可能陷入新旧文化交织的治理真空。当农村支部缺乏城市支部的文化支援时，基层权力行使者易借由城乡信息不对称形成垄断，将旧国家机关的官僚作风带入农村治理中，而农民因文化隔阂难以形成组织化的监督力量，致使腐败风险在文化落后的缝隙中累积。

列宁对城乡文化联系的制度化建构设想，本质上是对提升农村地区文化的系统性设计。列宁认识到，农村腐败的高发不仅源于经济结构或制度漏洞，还源于城乡文化断裂所导致的治理主体能力失衡。他提

出的“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3]364}的实践路径，旨在通过组织化的文化传输，打破城乡文化割裂状态，使农村获得抵御腐败的文化免疫力。这一分析超越了简单的空间区隔视角，将城乡关系纳入廉政风险的文化透视框架，揭示出因先进文化输送的缺位，农村既无法共享城市工人阶级的政治文明成果，也难以建立基于现代文化素养的治理参与体系，最终成为腐败易发、多发区域。列宁的论述深刻表明，在社会主义政权建设中，若不能以自觉的文化战略弥合城乡文化鸿沟，农村便可能因文化建设的滞后而成为廉政风险的高发地带，这一重要论断既立足苏俄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也为理解文化提升在农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模式。

四、结语

苏俄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兴衰成败是国际共运史上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列宁时期是这一探索的起点，列宁关于执政党如何抵御自身腐化的廉政风险特别是文化根源上的风险的思考和实践，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源。

列宁对文化因素在执政党廉政风险中作用的强调，彰显了他作为革命领袖的深刻洞察力和远见卓识。列宁认识到，仅靠政权更迭和制度约束不足以根除腐败，必须进行一场提高文化水平、改造社会心理、树立共产主义道德等的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同时，列宁对旧文化腐蚀执政党的警惕，实质上是对执政后权力异化、脱离群众等危险的深刻认识，这也为后来理解“糖衣炮弹”攻击、特权思想滋生、官僚主义蔓延等现象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应对参照。因此，通过文化视角的切入，全面审视和把握十月革命后列宁关于执政党廉

政风险的思想，不仅能够清晰地展示列宁思想的深邃性和对长期执政规律的早期探索，而且也有助于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后尤其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执政后所面临的独特挑战和内在风险规律。此外，其对当前全球范围内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反腐败斗争、廉政文化建设、保持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等都具有深刻的实践启示价值，凸显了其强烈的时代关联性。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周来顺. 列宁文化批判思想基本向度、价值逻辑和当代意义[J]. 求是学刊，2024

(1):23-35.

[3] 列宁全集：第 4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 贺敬垒. 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及其当代启迪[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12):106-120.

[5] 吕薇洲，廖彬. 列宁对防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探索[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1):45-51.

[6] 列宁全集：第 4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 王彦龙，徐康洲. 列宁晚年文化观及其对文化传承发展的启示[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5):83-94.

[8] 列宁全集：第 36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9] 魏志达，洪书源. 列宁晚年关于构建监督合力模式的重大创新[J].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4(3):28-35.

责任编辑：马俊

(上接第 10 页)

[10]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 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

[11]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 逢先知，金冲及. 毛泽东传(三)[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6] 陈云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4.

[18]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1] 胡锦涛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 年版)[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23] 王玉堂. 百年大党独有难题与破解之道[J].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4(1):3-8.

责任编辑：朱少家

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内容框架、 执行偏差与优化路径 ——以 A 省为例

程路 邓祺 赵妮

(安徽青年报社,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大学生返乡创业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与人才振兴的关键举措,对实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返乡创业离不开政策体系的支持引导,本文基于对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与政策服务对象的个案访谈与实地调研,归纳现阶段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内容体系,并借助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受政策自身缺乏配套、执行部门协同不足、目标群体参与不够、社会认知偏差等因素的影响,存在形式化执行、分散化执行、单向度执行、选择性执行等情况。由此提出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执行的优化路径:完善政策配套措施,增强政策可执行性;强化部门联动协同,推动政策整体实施;聚焦目标群体需求,构建政策反馈机制;加强政策宣传引导,优化政策执行环境。

[关键词]大学生返乡创业 支持政策 政策执行分析 执行偏差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持续推

进,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学习、务工、经商,在推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农村人才流失、产业凋敝,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进入新时代,为了扭转城市对农村

基金项目:2025 年度合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合肥新就业青年群体社会融入与权益保障机制研究”(立项编号:HFSKYY202530);2024 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激发‘两企三新’青年‘磁场’效应工作机制研究”(立项编号:2024CX511)。

收稿日期:2025-05-21

作者简介:程路,安徽青年报社副社长。邓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赵妮,安徽建筑大学讲师。

人才的单向吸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引导和支持各类人员返乡创业,以人才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作为返乡创业大潮中最有创意、最有活力、最有闯劲的群体,返乡创业大学生是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增量、产业振兴的重要动力,已成为各地返乡创业政策的重点支持对象。

与农民工“代际回流”式返乡创业、企业家“扶贫投资”式返乡创业不同,大学生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相对匮乏,返乡创业行为兼具“冲动性”“易变性”与“模糊性”,更加依赖于政府的政策扶持^[1]。政府公共政策从文本或话语形态向政策目标的转化并不是一条直线过程^[2],而是高度依赖政策的执行实践,完善的政策内容体系只有与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相衔接,才能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近年来,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搭建起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体系,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受到政策本体、实施主体、目标群体、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政策执行出现偏差,导致政策效果偏离既定目标,未能充分发挥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支持效能。因此,总结现阶段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内容框架,分析政策执行偏差的具体表现,对进一步优化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引导更多大学生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界关于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研究主要从政策建构、政策需求与政策供给三个层面展开。一是从政策建构视角探讨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建构逻辑与内容体系,大学生返乡创业是实现个人价值、推动乡村振兴、助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有机统一^[3],应从创业指导、意识塑造、政策支持、服务支撑、营商环境、社会融入等方面构建政策支持体系^[4]。二是从政策需求视角归纳返乡创业大学生对支持政策的现实需求,大学生返乡创业存在信息不对称、资源缺乏、经验不足、试错成本高等问题,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学生”四方联动构建创业支持体系^[5],更加优质的创业引导、创业教育、创业服务与创业孵化机制是返乡创业大学生主要的政策需求^[6],优化乡村创业环境与培养创业实践能力是提升大学生返乡创业行为倾向的有效手段^[7]。三是从政策供给视角分析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功能发挥与现实困境,政策体系在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角色定位与关键功能^[8]。但现阶段政策体系仍存在针对性不强、融资渠道不畅、创业教育滞后、创业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支持力度有待提升^[9]。

总体来看,现阶段针对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研究数量较少,大部分研究都遵循着“现状-问题-建议”的应用对策研究范式,更多关注政策内容与政策成效两端,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偏差错位关注不足。因此,本文引入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在总结现阶段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内容框架的基础上,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偏差,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以期能够充分发挥政策的支持效力,助力大学生返乡创业。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对象

(一) 基于史密斯模型的政策执行分析框架

政策执行是一切公共政策实现既定目标的核心环节。自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专家先后建立多个政策执行理论模型,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其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史密斯 1973 年在《政策执行过程》一文中提出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即“史密斯模型”。史密斯将影响政策执行过程的因素归纳为四类:一是理想化的政策,即合法、合理、科学的政策方案;二是执行机关,即负责政策具体执行的政府职能部门或机构;三是目标群体,即政策执行指向的具体对象群体;四是政策环境,即与政策执行相关联的外部环境。这四类因素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内在矛盾与紧张关系,需要不断以正式或非正式手段处理紧张关系,建立新的执行机制,并将相关信息反馈给政策制定者,从而不断优化政策内容与政策执行体系^[10]。

史密斯模型跳出了通过调整政策内容来完善政策的研究思路,加入了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关、目标群体、政策环境四个影响因素,对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全面检验,为探究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执行偏差提供了有效工具,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政策执行路径、提升政策对大学生返乡创业

的支持效果。为此,本课题基于史密斯模型构建了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执行分析框架(见图 1)。

(二)研究对象与案例选择

A 省作为中部农业大省,高度重视大学生返乡创业工作。近年来,省政府先后出台《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通知》《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支持各类群体尤其是大学生返乡创业。本文以 A 省为例,总结现阶段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内容框架,并着重分析相关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执行偏差情况。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取个案访谈与田野调查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实地走访与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相关的各级政府部门,掌握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出台情况;另一方面,面向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与政策服务对象三类群体开展个案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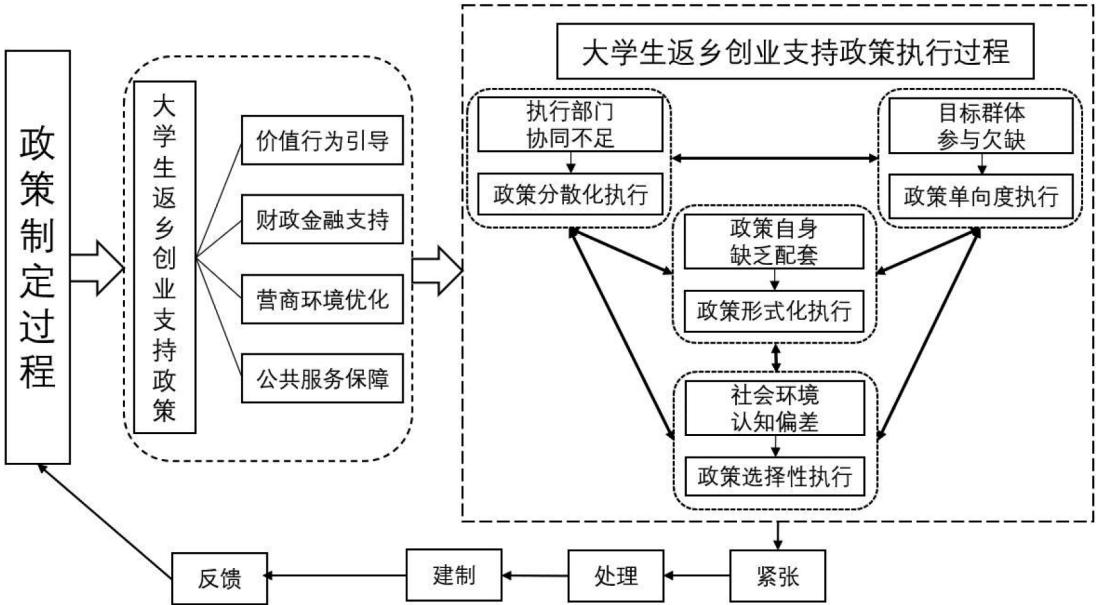


图 1 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执行分析框架

谈,了解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执行情况。在访谈对象选取上,关于政策制定者,选取5名省政府下属部门负责人负责制定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业务处室领导开展访谈(见表1:A1-A5);关于政策执行者,选取5名县级政府负责执行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业务科室负责人、乡镇分管领导、基层金融机构负责人开展访谈(见表1:B1-B5);关于政策服务对象,从A省大学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名单中选取10名返乡创业大学生开展访谈(见表1:C1-C10)。

三、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内容框架

(一) 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价值行为引导政策

在长期城乡二元分割的发展模式影响下,城市与农村在就业机会、生活服务、公共设施等领域存在显著的差异,城市成为大学生就业创业的首选区域,返乡下乡就业创业长期处于被大学生遗忘和忽视的状态^[1]。因此,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开展政策宣传与创业指导,

表1 个案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所在部门	工作职责	编号	出生年份	学历	创业项目
A1	省发展改革委	审核省发改委出台的政策文件,对政策内容进行合规性审查	C1	1993	本科	稻虾共养与大米销售
A2	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处	指导全省创业就业工作,出台全省支持创业就业政策文件	C2	1992	本科	规模化种养殖与观光农业
A3	省农业农村厅	负责全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全省农业产业化指导处	C3	1989	大专	小龙虾养殖与技术咨询
A4	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	负责全省农村电商培育工作	C4	1987	大专	生态农产品线上销售
A5	省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局	负责全省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企业注册登记管理	C5	1988	本科	种养结合的循环农业
B1	H市农商行乡镇支行	负责小微企业贷款办理、审核	C6	1988	硕士	水蛭规模化养殖
B2	S县人社局	分管全县大学生、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工作	C7	1981	本科	果树种植与体验农业
B3	T市农业农村局	负责全市(县级市)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经营主体培育	C8	1993	本科	铜陵白姜的制作销售
B4	J县发改委	贯彻落实上级就业创业方面政策文件,推动重大项目建设	C9	1986	本科	水稻种植与米酒加工
B5	C区M乡政府	分管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工作	C10	1987	本科	祁门红茶的生产销售

重塑大学生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现状和乡村创业机遇的认知,让大学生“想回乡,要创业”。A省出台的一系列支持返乡下乡创业创新文件都明确将高等院校毕业生作为重点支持的群体,并提出通过宣传政策措施、推介创业创新优秀带头人、选树先进典型等措施引导大学生返乡创业。一方面,通过在高校内组织开展优秀返乡创业大学生事迹报告会与返乡创业政策推介会等,面向大学生介绍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实践模式与成功经验,以政策宣传与事迹宣讲引起大学生对返乡创业的关注。另一方面,通过实施“请您回家”活动,以省外大学生恳谈会等方式,主动对接在外求学、就业的大学生群体,组织参观返乡创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创业创新企业等,让他们直观感受到家乡新面貌和乡村振兴重大成果,同时向其介绍返乡创业在用地保障、融资支持、招工用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激发大学生对返乡创业的向往。

(二) 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

涉农产业往往具有前期投资大、收益周期长的特征,对于缺少工作积累与个人储蓄的大学生,有效筹集创业启动资金是开展返乡创业活动的基础条件。因此,提供及时、有效、持续的财政金融支持是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大学生从返乡创业意愿向返乡创业行动转变的关键举措。A省重点从三个层面强化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财政金融支持:一是设立多层次的创业扶持基金,在省级层面设立大学生返乡创业引导资金,对获评大学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的创业项目提供5万元资金奖补,同时,对首次创业并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返乡创业大学生,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一次性5000元创业补贴,为大学

生返乡创业提供直接性的资金支持。二是构建系统性的信贷支持体系,规定大学生创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15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由财政给予贴息,支持保险类金融机构开发返乡创业大学生贷款保证保险产品,为大学生筹集创业启动资金提供有效金融支持。三是完善返乡创业大学生信用征集、评价和运用机制,放宽对返乡创业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支持银行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企业延长贷款周期,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农村产权纳入融资担保抵押范围,为大学生返乡创业项目提供持续性的融资服务。

(三) 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营商环境优化政策

大学生返乡创业项目普遍具有规模小、资金少、形式多样等特征,同时,由于大学生长期在外生活,对乡村经营环境与返乡创业政策不够熟悉,抗风险能力偏低,更加需要良好的基层营商环境为返乡创业保驾护航。A省围绕大学生返乡创业的项目特征与经营需求,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营造对大学生更有吸引力、对返乡创业更有支持力的基层营商环境。一方面,有针对性地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简化企业登记方式,实行市场主体经营场所“申报承诺+清单管理”登记,持续推动“照后减证”,放宽经营场所登记规定,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允许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以土地收益权、农业生产工具实物及知识产权作价出资,降低大学生返乡创业门槛。另一方面,要求县级层面普遍制定创业公共服务清单和公共服务指南,设立返乡创业“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编制大学生返乡创业政策一本通,对大学生返乡创业项目入驻产业园区、孵化基地等场所或租用标准化厂房,由当地政府对租金、物业费、管理费等给予一定额度减

免,同时,全面落实农业优先发展、扶持小微经营主体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等税收优惠政策,为大学生返乡创业、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政策保障与资源支持。

(四) 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公共服务保障政策

推进大学生返乡创业不仅要聚焦创业项目对金融服务和营商环境的现实需求,还要关注大学生群体对乡村创业场景和个人生活保障的期待,通过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保障政策,完善创业基础设施、强化社会保障衔接、拓展个人发展渠道,让返乡创业大学生不仅“干得好”,而且“留得住”,在返乡创业实践中实现助力乡村振兴与彰显个人价值的有机统一。A省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强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建设,实施“快递进村”工程,增加村级快递网点数量,提升农村物流服务质量,切实优化乡村创业的基础设施条件,同时,在全省建设、认定一批青年创业园、返乡创业园,重点为返乡创业大学生等提供低成本经营场所和专业化创业服务。在社会保障方面,A省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衔接办法等,为返乡创业大学生妥善办理社保,推动各地将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大学生纳入住房保障政策覆盖范围,给予一定租赁补贴。此外,A省高度重视返乡创业大学生的技能培训与能力提升,支持高职院校、优质教育培训机构面向返乡创业大学生制定专属性培训计划,对创办、领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优先列为科技示范户和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培育对象。

四、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执行偏差

借助史密斯模型对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大学

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执行偏差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 缺乏配套导致政策形式化执行

政策本身的合法、合理、科学,是政策执行的首要条件,只有形成清晰明确、科学合理的政策内容体系才能使政策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从而达到既定的政策目标^[12]。现有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涵盖了创业意愿培育、创业资金支持、创业环境营造、创业服务保障四大领域,但是政策体系缺乏完善的配套机制,导致政策“虚化”“空转”,在实践中有形式化执行的情况。

一方面,部分政策缺少与之配套的政策工具。如A省《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提出“市县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符合条件的返乡入乡创业产业园、示范区(县)建设项目”,但是对于返乡创业产业园区应当符合哪些条件,并没有明确规定,尤其是在地方财政紧缩的大背景下,市县通过专项债券支持返乡创业园区建设的意愿和能力都不足,难以有效支持返乡创业园区建设。

另一方面,部分政策目标缺乏相应的评估考核机制。如《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打造一批返乡入乡创业产业园、示范区(县),全省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到85万人以上”的政策目标,但是仅明确要求对返乡入乡创业产业园、示范区(县)建设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并未将引进返乡创业人员数量作为考核内容。

(二) 协同不足导致政策分散化执行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依赖特定执行主体进行落实,执行主体的内部结构、组织体系与工作机制都与政策执行效果密切相关。尤其是当一项公共政策具有多重属性,内容涉及不同政策主体与执行部门,其政

策目标的实现更取决于多部门之间的相互合作与有效协同^[13]。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是由多个政策主体与多重政策文本共同构成的政策系统,从政策概念构成要素看,“大学生”对应教育部门,“返乡”对应农业农村部门,“创业”对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相关政策内容更是涉及财政、税务、金融等多个部门系统,因而具有显著的多重政策属性。

但是,不同政府部门在政策倾向、利益诉求、工作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在缺乏有效的协同推进机制的情况下,整体性的政策体系实际上由各部门分散化、差异性执行,导致政策难以实现预期效果。A省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主要采取责任分工的形式将政策任务分解到具体执行部门,但各执行部门的统筹协调与工作衔接不够,甚至出现政策重复、矛盾的情况。

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有效执行不仅依赖政府部门的直接推动,也需要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以及金融体系的支持等。然而,现有政策设计未能构建一套覆盖各类执行主体的激励整合机制,政策价值导向与考核激励机制未能充分兼顾各类政策执行部门的价值诉求,难以有效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政策实施。金融机构强调风险控制的工作规范与返乡创业金融支持政策要求之间存在激励目标偏差,在缺乏相应的激励补偿机制与风险分担机制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向返乡创业大学生提供金融服务和贷款支持的动力不足,导致政府部门与金融体系在政策执行上协同不足。

(三)参与不够导致政策单向度执行

公共政策执行是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目标群体对政策的理解接受和有效反馈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环节,也是公共政策内容体系持续

优化的重要条件。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是为特定群体提供服务的公共政策,具有显著的目标指向性和服务导向性,目标群体的政策参与和成效反馈是评价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指标。但是,在政策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到目标群体政策知晓率偏低、政策反馈渠道狭窄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单向度特质,即政策执行中返乡创业大学生的主动参与和有效反馈不够。

一方面,返乡创业大学生争取政策支持的主动性不足。从访谈中可以发现,返乡创业大学生往往是在对政策了解不多的状态下开始创业活动的,在创业初期并不清楚政府出台了哪些创业支持政策,也不知道自己符合哪些政策的申报条件,没能及时向相关部门申请政策支持。同时,一些返乡创业大学生认为自身创业项目规模小、资金少,在当地缺乏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源,获取政策支持的可能性不大,从而忽视对支持政策的争取。实际上,政策执行部门难以及时掌握区域内返乡创业大学生群体的详细信息,政策执行高度依赖于目标群体主动申报,争取政策支持的主动性不足导致相当数量的返乡创业大学生在创业实践的前、中期未能充分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返乡创业大学生参与政策执行的渠道匮乏。尽管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是一项高度指向目标群体需求的公共政策,但现有政策体系并未建立完善的面向目标群体的意见收集机制和政策反馈机制,返乡创业大学生群体既缺乏渠道将自身需求传递给政策制定者,也缺乏渠道将政策执行效果反馈给政策执行者。在目标群体有效参与和反馈均不足的情况下,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可能偏离返乡创业大学生的实际需求,提供的支持政策“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进一步弱化了返乡

创业大学生申请政策支持的积极性。

(四) 认知偏差导致政策选择性执行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需要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实施,并受到所处社会环境与公众认知的影响。尽管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政策宣传力度不断加大,但社会层面对大学生返乡创业行为仍存在一定认知偏差,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象征性、选择性执行的倾向。

一是认为大学生缺乏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前期资金技术积累少,在农村缺少人脉关系,而返乡创业对个人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农业产业也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的特点,大学生很难承受创业过程中潜在的风险挑战。受到这种认知偏差的影响,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支持社会阅历与资金积累更加丰富的返乡农民工和退役军人,而选择性忽略对返乡创业大学生的政策支持。

二是认为大学生长期在高校学习、在城市生活,很难适应农村的生活环境,回到农村创业也不一定能够坚持下来,即使创业成功也会很快回到城市生活,难以真正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受到这种认知偏差的影响,政策执行往往优先对本地出身和农村户籍的返乡大学生进行帮扶,而对外地出身和城市户籍大学生的主动帮扶意识不强。

三是认为大学生与其他返乡创业群体并没有不同之处,常规的返乡创业支持政策已经足够,不需要针对大学生提供额外的政策支持。受到这种认知偏差的影响,基层政府更倾向于实施覆盖面更广的返乡创业支持政策,一些面向大学生群体特征和需求制定的专属性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弱化。

五、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执行的优化路径

(一) 完善政策配套措施,增强政策可执行性

政策方案制定是政策执行的起始点,政策方案的科学合理性将影响政策执行的方向与效果^[4]。为了提升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执行效果,要完善政策配套措施,为政策执行提供有效的政策工具。一方面对于倡导性的政策内容,如利用存量土地建设返乡创业产业园、政府引导基金支持返乡入乡创业、拓展贷款抵押物范围等,要及时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确保每一项支持政策都有具体的执行标准和落实机制,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另一方面要健全政策体系的执行保障机制,将帮扶返乡创业大学生数量与政策支持效果纳入政策督察与评估考核,确保政策评估考核内容与政策目标能够有效对应,从而形成政策实施闭环。

(二) 强化部门联动协同,推动政策整体实施

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涉及十多个政府部门和各类金融机构,只有实现各部门之间有效的沟通协调与联动协同,才能确保政策执行取得最优成效。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征求职能部门、金融机构、担保公司等政策执行主体的意见,找准工作切入点与业务契合点,有效兼顾和整合不同执行主体的利益诉求,为各类执行主体推进政策实施提供有效的行动激励。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着力构建整体性、系统化的政策执行机制,在省市层面成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涵盖相关执行部门的大学生返乡创业工作领导协调机构,强化各类执行主体之间的政策协同与工作统筹,及

时解决执行中出现的政策衔接不畅、部门施政矛盾,形成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合力;在县级及乡镇政府设立综合性的大学生返乡创业服务平台和咨询窗口,推动各项公共服务政策由分散办理到集中办理,简化政策咨询与办理流程,同时,加强对基层政策执行人员的业务培训,让他们掌握政策的整体内容、政策适用的重点群体、政策执行的关键环节,以及返乡创业大学生的基本特征、政策需求等,帮助他们提升政策执行能力。

(三)聚焦目标群体需求,构建政策反馈机制

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构建更加聚焦大学生返乡创业实际需求的政策体系与执行机制。在价值行为引导上,充分激发大学生的家乡情怀与创业热情,构建“政策讲解-理论教学-案例展示”相结合的培训机制,提高大学生的返乡创业能力;在财政金融支持上,针对大学生对创业资金的普遍需求,搭建“创业项目-评估机构-担保公司-金融机构”的四方联动机制,对可行性高、发展前景好的创业项目简化申请手续、降低担保条件、提供贴息服务;在营商环境优化上,聚焦返乡创业大学生对场地、技术、市场的需求,合理规划大学生返乡创业园区,搭建返乡创业项目市场信息平台、技术交流平台、社会融资平台,为项目运营提供全方位服务;在公共服务保障上,探索设立大学生返乡创业失败补助,对创业失败、企业注销的大学生发放临时补助,补助金额根据其纳税额、社保缴费额等确定。同时,要建立健全返乡创业大学生的政策反馈机制,一方面,公开业务部门联系方式,畅通大学生向上反馈政策需求的信息渠道,及时收集处理大学生返乡创业政策需

求信息;另一方面,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定期收集关于返乡创业大学生的政策享受情况、经营发展情况等方面的信息,了解大学生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具体评价和意见建议,及时调整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偏差,提升政策执行的精准性。

(四)加强政策宣传引导,优化政策执行环境

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有效执行有赖于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公共舆论。为此,地方政府要将促进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措施,创新政策宣传引导机制,通过在高校召开返乡创业专题宣讲会、在政务服务 App 开设返乡创业专区、及时更新大学生返乡创业政策汇编等方式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政策宣传矩阵,让“农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观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大学生的政策知晓度和创业积极性。通过开展大学生返乡创业项目竞赛、大学生返乡创业优秀项目评选等活动,选树一批大学生返乡创业成功案例,并广泛利用报刊、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开展宣传,营造支持创业、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舆论环境,让大学生返乡创业行为得到家人和社会的充分肯定和支持,形成全社会鼓励、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浓厚氛围。

参考文献:

- [1] 刘志阳,陆亮亮.新时代劳动力返乡创业何以破题——系统治理的框架建构与政策协同[J].探索与争鸣,2023(7):145-155.
- [2] 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1(5):61-79.

(下转第 64 页)

建设江淮粮仓合肥示范区路径研究

徐小满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 合肥 230051)

[摘要]近年来,合肥市把粮食生产作为全市“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以建设千亿斤江淮粮仓为奋斗目标,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以及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调研发现合肥市粮食生产领域仍存在科技支撑与转化应用不足、产业链条衔接不紧、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农业金融保险滞后等问题。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扛牢粮食保供责任的大背景下,提出建设江淮粮仓合肥示范区的路径。

[关键词]江淮粮仓 合肥示范区 路径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考察安徽,强调安徽是粮食生产大省,要建设江淮粮仓,扛牢粮食保供责任,实现农民生产粮食和增加收入齐头并进。近年来,合肥市大力实施千亿斤江淮粮仓建设行动,坚持“稳定面积、主攻单产、规模经营、均衡增产”,着力抓实粮食生产关键环节,有序推动粮食生产稳政策、稳面积、增效益,粮食产能不断提升。

一、建设江淮粮仓合肥示范区的政策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什么时候都要绷紧,一刻也不能放松。”安徽以占全国 4.3%的耕地,生产了全国 6%的粮食,是全国 5 个粮食净调出大省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安徽考察指导,为安徽省加快农业强省建设,推动新时代粮食生产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注入了动能。2024 年初,安徽省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千亿斤江淮粮仓的指导意见》。合肥市也随即出台《关于千亿斤粮食产能

基金项目:2025 年度合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建设江淮粮仓合肥示范区路径研究”
(立项编号:HFSKYY202544)。

收稿日期:2025-05-21

作者简介:徐小满,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建设落实方案》，提出到 2030 年，全市粮食产量比 2022 年增产 8.2 亿斤，达 67.1 亿斤；到 2035 年，全市粮食产量比 2022 年增产 14.1 亿斤，达 73.0 亿斤。全市耕地面积稳定在 705 万亩以上，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不低于 618 万亩，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790 万亩以上，粮食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5%，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8.5% 以上，选育应用一批突破性粮食作物新品种。优质专用水稻、小麦种植面积占比达到 95%，粮食生产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占比达到 80%。全市粮油加工业产值达到 500 亿元。

二、合肥市全方位提升粮食产能的措施

近年来合肥市聚焦粮食生产，以良种、良田、良法、良机、良制“五良集成”为引领，全面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2024 年，全市粮食产量 302.32 万吨，同比增长 1.2%，近 5 年首次超 300 万吨。夏粮播种面积同比增长 1.05%，高于全省 0.58 个百分点；总产量同比增长 1.47%，高于全省 0.42 个百分点。

（一）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增产根基

目前，合肥市连片开发、整县推进，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431.68 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 69.8%。根据合肥市地形地貌、土壤条件、水资源分布等情况，结合市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明确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具体目标和指标，按照平原圩区、低山丘陵区、丘岗区等不同类型分区域、分类型差异化整治。建立全市土地规模流转季度统计和分析制度，通过加快土地集约经营，有效带动高标准农田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经营，全产业链发展。2023 年，全市流转土地面积 527.64 万亩，流转比例

72.63%，其中流转面积 300 亩以上的 431.77 万亩，占比 81.83%。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以重大项目为支撑，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提标，从 2024 年起，执行丘岗 5600 元、低山丘陵 5000 元、平原圩区 3800 元、改造提升 3000 元的高标准农田亩均投资建设标准。2024 年，市财政按照新建 4200 元/亩、改造提升 3000 元/亩的标准提前下达 5.2 亿元市本级高标准农田建设奖补资金，同时争取 14.2 万亩高标准农田增发国债项目，总投资达 5.58 亿元。制定出台《合肥市农田建设工程管护工作规程（试行）》，坚持“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对具备条件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发挥县级乡投公司作用，实行规划、建设、运营、管护、融资“五位一体”综合模式。

（二）加强新品种研发推广，赋能农业生产

合肥市坚持创新引领，推进保种、护种、育种、引种、用种“五种并进”，现代种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合肥市持证种业企业 265 家，居全省第一，占全国约 3%，其中种业 A 股上市企业 2 家，与北京市并列全国第一；国家级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 9 家，居全国第二；入选国家种业阵型企业 7 家，其中农作物种业企业 5 家，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二；入选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3 家，居全国第二。近三年全市种业销售收入每年递增 10% 以上，2024 年达 120 亿元。种业企业年产粮食种子约 9 亿斤，杂交水稻种子出口额连续 5 年居全国第一。科创能力持续增强。目前，已建成种业研发平台 40 个，其中国家级（部级）10 个、省级 19 个、市级 11 个。建成荃银高科“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丰乐种业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江淮园艺“国家一带一路联合研究实验室”等重点企业育种平台。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与长丰县人民政府合作共建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助力合肥“种业之都”建设。品种培育成效明显。2022年以来,全市共521个新品种获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权授权,主要农作物通过国家审定品种370个,均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二,分别占全省64%、80%。

(三)推动新技术应用,破解增产密码

合肥市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高质量推进都市现代农业强市建设,2024年全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71%。强化协同攻关,与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省农科院、荃银高科、丰乐种业等单位合作,联合开展粮食产能提升技术攻关,以科技赋能粮食生产,通过对种肥同播、高质高效栽培等单项技术进行集成创新,为粮油作物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技术引领。促进粮食主推技术落地应用,推行“专家—农技人员—示范合作社(企业)”服务模式,开展农业技术集成应用,加强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市、县发布主推技术74项,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四新”推广416项,形成“绿色增粮”产能创建技术模式,主推技术到位率100%。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28个,项目资金使用率达90%以上。强化防灾治害。全市共建立乡镇病虫测报网点25个,实现病虫疫情监测全覆盖。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58.2%以上,“三大主粮”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达61.1%以上,实现“虫口夺粮”。

(四)做强装备支撑,提升发展质效

出台《合肥市促进“两强一增”行动若干

政策》,对符合条件新建及改扩建育秧中心、烘干中心、农事服务中心,按照投资额给予一定比例奖补,支持本地农机生产企业加大装备补短板研发和推广力度。每年建设四个省级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和农机农艺融合示范基地,鼓励省市示范区共建。市本级建立10个水稻全程机械化示范区,集耕种收管烘和秸秆打捆为一体,每个面积达5000亩,示范区机耕、机插秧、机收、机防、粮食烘干和秸秆打捆6个环节机械化率均实现100%。全市大型复式智能高效农机占比达26%,年增长4个百分点。截至2024年底,全市农机总动力达511.7万千瓦,拥有各类农机合作组织7196个。年更新购置农机1.4万台套,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7.4%,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3.1和1.4个百分点。支持本地农机生产企业加大农机装备补短板研发和推广力度,全市拥有农机装备企业70多家,年营收达59亿元。其中色选机企业40余家,年营收40亿元,占据国内80%、国际50%的市场份额。

(五)创新社会化服务模式,精准提供帮扶

围绕“田谁来种、生产谁来服务、利益如何联结”等问题,突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把社会化服务应用到粮食生产全过程。合肥市委、市政府立足高位,将社会化服务体制机制创新工作纳入市委“一号文件”的重点工作加以部署和落实。建立财政政策支持与融资保险共同投入的扶持机制,将社会化服务纳入《合肥市促进“两强一增”行动若干政策》补助范围。2024年,合肥市财政局共拨付农业保险补贴资金4.6亿元,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30亿元。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投保种植业达734.7万亩、

养殖业 70.2 万头、森林 36.3 万亩。合肥市各类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已超过 7300 个,服务面积 660 万亩,社会化服务贯穿产前、产中、产后全环节。因村制宜、因户制宜、因田制宜、因种制宜,围绕种、管、收、销等全过程、全环节,积极探索适应产业发展要求、符合农民意愿的服务模式。先后发展以庐江县喜洋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保姆式”全程化服务、以肥西双全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菜单式”多环节服务、以肥西县稻然农业有限公司与中化集团合作为代表的“订单式”专业化服务、以长丰红桥为代表的“股份式”合作化服务等。

三、合肥市现阶段粮食生产领域存在的问题

合肥市主动适应粮食生产的新常态,坚持“稳定面积、主攻单产、规模经营、均衡增产”,着力抓实粮食生产关键环节,有序推动粮食生产稳政策、稳面积、增效益,加速粮食生产发展方式转变,探索江淮粮仓合肥示范区稳粮增效的新路子。但在稳定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仍有压力,现阶段粮食生产领域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科技支撑与转化应用不足

当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仍相对较低,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优良新品种、节本增效栽培技术、智慧农业技术等在生产一线的普及率和到位率有待提高。虽然农机服务、植保服务等覆盖面扩大,但是社会化服务质效仍有待提升。针对合肥地形、气候等特点研发的专用品种、农机、农艺技术的供给和推广力度仍需加强。

(二)产业链条衔接不紧

随着粮食市场流通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合肥市粮食作物不仅面临自然风险挑战,

还要经受市场风险考验。粮食精深加工能力相对不足,本地产业链条短,附加值创造能力有限,难以有效反哺生产环节,难以实现优质优价,影响农户种植优质粮的积极性。虽建立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大户)+基地”的利益联结机制,但实际联系较为松散,并未真正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同享。

(三)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较低

2024 年安徽省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合肥市常住人口总量达 1000.2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86.38%,高于全国、全省 19.38 和 23.81 个百分点。乡村人力资源不断流失,懂经营管理、市场拓展的新型职业农民较少,专业技术人才匮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难,这些潜在的隐患对粮食安全生产构成威胁。

(四)农业金融保险仍显滞后

目前,合肥市农村信贷抵押担保、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仍相对滞后。部分中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认知有限,参保意愿不高。传统成本保险占主导,对设施农业、大型农机等风险的保障不足。而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和专业大户因缺乏金融机构认可的一般抵押物,导致贷款难度较大。金融机构对农户和经营主体的风险评估成本高、风控难,导致贷款门槛高、手续繁琐、利率上浮。

四、建设江淮粮仓合肥示范区的路径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对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任务,针对合肥市当前粮食生产领域存在的问题,立足全市粮食生产资源禀赋,推动全市粮食生产能力显著跃升、粮食生产条件显著提升、粮食产业效益显著攀升,构建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

势充分释放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千亿斤江淮粮仓建设提供“合肥样本”。

(一)坚持良田粮用,良种增粮

扎实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加快找回流失耕地。严格耕地种植用途管制,严格管控一般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落实《合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导则》,统筹新建和改造提升,按照“平原圩区、丘岗区、低山丘陵区”分类、分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耕地质量。扩大投资渠道,争取超长期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鼓励乡村振兴公司投资建设高标准农田。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加快建设种业之都,强化种业科技支撑。用好用活种业基金,打造“江淮种业产业园”。支持种业企业做大做强,培育一批种业龙头企业,推动一批种业企业上市。加快江淮种业产业园选址立项,推动与生物育种安徽省实验室、国家级农高区等高能级创新平台联动共建,积极争取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在合肥设立“江淮基地”,提高种业核心竞争力。

(二)坚持藏粮于技,科技创新驱动

做好粮食生产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四新”技术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和集成应用,提高主要粮食作物关键技术模式到位率和覆盖面。加大农机社会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做好粮食生产科技自主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和集成配套应用,加快先进实用技术由点及线到面推广,充分挖掘地种肥药各要素、耕种管收各环节的增产减损潜力。支持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合理布局建设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推广“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等新业

态新模式,完善农技推广体系。依托农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建强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一批粮食生产类农业行业首席专家工作室、科技小院,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培育技术骨干。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建立科技特派员“需求库”,发展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实现行政村服务全覆盖。做好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工作,健全乡镇级农技推广机构,充实专业技术人员,提升每千名农业从业人员拥有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人员数量。创新农业科技服务机制,构建运行高效、服务到位、支撑有力、农民满意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加快粮食智慧生产进程。推进粮食生产智慧化改造升级,应用北斗导航、远程运维、智能驾驶系统、作业过程自动测量等智能化设备,实现耕整地、播种、施肥、施药、收获等过程精准作业。建设田间综合监测站点、物联网测控系统,实现可视、可管、可控的数字化粮食生产模式。

(三)坚持三产融合,全产业链开发

强化产销对接,抓好优质专用小麦、水稻生产,按照“单种、单收、单储、专用”要求,发展“按图索粮”和订单式生产,实现优粮优价。开展优质专用粮精深加工“双招双引”行动,实施一批大型粮食精深加工项目,打造稻米、小麦 300 亿级绿色食品产业,建设绿色食品产业集群。支持一批集粮食生产、加工、储备、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做大做强。鼓励龙头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结成产业联盟。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培育粮油类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皖美农产品”“皖美粮油”为重点,大力打造“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的合肥粮油品牌体系,提升合肥粮油品牌在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统筹粮食产业产前、

产中、产后融合发展,积极做大龙头企业,切实优化粮食加工、仓储物流设施布局,拓展直供直销、会员配送等新产业新业态。积极探索以粮食产业为主的三产融合模式,突出合肥人文资源、地理生态、粮食资源禀赋。一方面,围绕粮食产业,发展粮食加工、休闲食品等业态,形成粮食产业全产业链。另一方面,打造“粮食+”产业发展模式。挖掘粮食文化内涵,加强江淮粮仓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推动创意设计、演出、节庆会展、休闲旅游等业态与粮食产业深度融合,从而提高农民收益,提升种粮积极性。

(四)坚持金融支粮,“贷”动粮食生产

金融支粮的核心是保障粮食安全,增强农业经营主体抗风险能力,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准识别需求,分层分类施策。根据贷款主体类型、粮食生产环节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展业务范围,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探索新型贷款业务,扩大抵押担保物范围。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周期性,提供灵活的贷款期限和还款方式。撬动社会资本支持,探索采取直接投资、投资补助、资本金注入、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政府支持方式,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粮食产能建设,探索推广投贷联动、政银保合作等投融资模式。建立健全粮食收购市场化融资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出台支持粮食生产专项政策,推行“无感授信、按需授信、随时用信”模式,保障粮食生产发展融资需求。在城区、开发区支持叠加开展补充性商业保险,在省财政补贴基础上,市、区财政合计补贴比例原则

上不低于省级标准。支持建立粮食作物保险保额动态调整机制,健全协同配合和风险分散机制。建立300亩以上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名录,精准做好金融服务。

(五)加强人才培育,建好人才队伍

端牢中国碗,装好中国粮,关键靠人。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引导社会化服务主体开展菜单式、订单式服务,深入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全面提高各类种粮主体技术素质,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推动各类服务组织组建粮食生产服务联合体,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全环节覆盖。优先将粮食生产带头人、粮食生产类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新农人等粮食生产经营主体纳入乡村能人培育计划。组织其参加免费的培训,并为他们提供政策、资金、土地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在培训工作开展前,了解他们的培训需求,针对不同农业项目,科学编制专项培训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在培训结束后,做好跟踪走访工作,帮助他们解决粮食生产、加工、销售等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真正发挥培训的效果。以产粮大县为重点,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落实《安徽省乡村振兴人才职称评审实施办法》,面向长期扎根基层、从事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民、新农人等,打破学历、论文、课题等限制,开展多专业多层级职称评审,激发“田秀才”“土专家”的粮食生产热情。

责任编辑:徐书琴

陈云的学习观及其现实启示

申颖洁 花勇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1620)

[摘要]陈云是党内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光辉典范和杰出代表。陈云学习观围绕“为什么学”“学什么”“如何学”,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习观。陈云强调首先要学习哲学,解决好思想方法对头的问题;要求领导干部发挥“领头雁”作用,下定学习的决心、坚定学习的信心,带头学习、模范学习,营造浓厚的党内学习氛围;主张把理论学习与向群众学习、向经验学习结合起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陈云学习观对于建设学习型政党、建设学习大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学习型政党 理论联系实际 调查研究 “十五字诀”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性学习史,依靠学习立党、兴党、强党,不断取得伟大胜利。陈云同志是我们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学习陈云同志刻苦学习的精神,要求广大党员“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1]。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同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学习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2]重温陈云同志的学习观,提升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通过学习增长知识、增强本领,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的重要论断

1938 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把学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一场学习竞赛,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3]的工作。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要求下,党内开展了一场集中化、系统化的学习运动。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结合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的实施情况 and 实践要求,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4]的重要论断。

收稿日期:2025-05-22

作者简介:申颖洁,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花勇,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一)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是对“学习是党员的标准”的进一步发展

1939年5月,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提出学习是党员的标准之一,要求党员干部主动学习、坚持学习、争取时间学习^{[41]42}。1939年12月,陈云发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进一步阐释了学习的重要性,分析了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党内学习的现状和不足,指出党员干部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成效与党中央的要求有显著差距,不能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要求党员干部履行学习义务,“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41]250},在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在革命战争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二)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是促进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学习意义的现实需求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要求全党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制定《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召开在职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党内掀起了学习的热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对学习的重要性的必要性理解不深,认为打仗敢冲、一天到晚不停工作就算尽了对党的责任,学习自觉性弱。陈云认为这种轻视学习的态度根源在于思想深处对学习的意义理解不深刻,没有深刻理解革命理论的指导价值。陈云援引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5]443}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艰巨的、中国革命的环境是变化多端的,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须从变化多端的

革命环境中理出头绪。革命工作绝不是“蛮干”,更不是“盲干”。革命的成功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工作能否做好,学懂弄通理论是关键。

(三)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是大党建设和管理的迫切要求

延安时期,党中央发布《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破除党员发展工作中的关门主义错误倾向,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发展和扩大党的组织。敌占区、国统区、根据地根据实际情况有步骤、有计划地大量发展党员。党员人数迅速增多,党组织覆盖面不断扩大。1937年党员人数4万多,1938年党员人数发展到40多万,1940年党员人数已经上升到80万人,1945年党员人数达到121万。从党员人数和党组织规模来看,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人数众多、规模庞大的大党。毛泽东从战略高度提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要求“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6]602}。陈云作为中组部部长,对党的规模之大和发展速度之快,比其他领导干部体会更早更深,越发感受到大党建设和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党员思想素质距离革命要求存在较大差距。陈云提出“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42]51}的工作方针,遵循“发展—巩固—发展”的原则,对党员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组织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史国情、学习军事知识、学习文化知识,全方位提高党员的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从思想上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价值观,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四)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客观要求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因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以及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历史分析,为人类社会进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陈云认为,要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重要方法。思想上的成熟决定政治上的成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有透彻理解,才能从思想深处彻底解决价值观的问题,清除和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随着延安学习运动不断深入,1945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员的义务被写入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重视学习从一个政策性的号召上升为制度性的规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陈云对学习和工作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出“要把学习作为指导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745]要求领导干部重视学习、带头学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陈云同志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中,提出领导同志责任重大,要“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7362],再次强调学习和工作密不可分的关系,要求牢固树立学习责任理念。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陈云反复强调“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学习是党员应尽的义务,把重视学习融入党的血脉中。

二、要求学习哲学学好哲学

延安时期,陈云向毛泽东同志请教如何在工作中少犯错误。毛泽东同志建议陈云

学习哲学。在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下,陈云“先学哲学,然后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7361],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读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著作。陈云晚年对学习哲学的重要性总结道,“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8314]特别叮嘱党员干部将学习哲学作为工作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一)将学习哲学列为学习的首要任务

陈云认为学习哲学是解决思想方法问题的关键,“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7360]共产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更重要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陈云认为,最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是最核心的东西。”^[9330]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转向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将之结合而形成自己的科学理论,创造性地提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延安时期,陈云集中系统学习哲学,受益匪浅。陈云自己分析道,学习哲学之前,自己的文章和讲话缺少辩证法;学习哲学之后,“讲话和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了辩证法了。”^[9330]正是因为延安时期集中系统学习哲学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陈云说自己“从思想理论上把王明的一套‘打倒’了”^[10224],彻底认清教条主义的错误本质,从思想深处解决了“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问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能够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中国问题。

(二)学习哲学要结合实际

重视学习哲学,与重视实践学习并不矛盾。陈云在《到什么地方学习》一文中指出,“真正政治上高明的革命家,只能在革命斗争中培养。”^{[4]252} 共产党员必须既具有革命经验又具有革命理论。单靠学习理论,熟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毫无革命斗争经验,“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因为使政治上开展的最基本的东西,是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没有实际经验,就没有政治上开展的基础。”^{[4]42}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落脚点在于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中国现实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实际中,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就是面向实践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光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4]26}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步深刻体会,”^{[1]349} 理论归根到底来自实践。陈云所强调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结合实践学习,学习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

(三)党的文艺工作者要更加主动地学习哲学

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2762} 大批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成为党的文艺工作者。这些组织上入党的知识分子,思想上还未经系统的党内教育,部分文艺工作者认为自己文化水平高,可以不学革命理论,甚至不同意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针对这种错

误观点,陈云指出,“判断我们的文艺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的,合不合群众的需要,除了学习革命的理论 and 革命的实际,还有什么旁的方法?”^{[4]27} 根据文艺工作者知识水平相对较高和多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特点,陈云特别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更加主动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关系文艺工作者的政治立场、关系为谁创作的根本问题。党的文艺工作者固然文化水平高,但多数文艺工作者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容易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他们的灵魂的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1]3857} 党的文艺工作者要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清除和抵制小资产阶级文艺观的侵蚀,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观。陈云要求党的文艺工作者将理论学习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作为源头活水,创作出更多符合人民需要的革命文艺作品。

学习哲学,是陈云学习观的核心内容。陈云认为这关系思路方法是否对头。“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4]361} 陈云将自己学习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著作的体会概括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7]371} “十五字诀”是一个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与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原则一脉相承。

三、老干部高级干部要成为学习的模范

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陈云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要求老干部高级干部“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4]188}。

(一)老干部高级干部要带头学习、模范学习

陈云要求老干部高级干部带头学习、模范学习,主要是基于以下四方面的考虑:一是老干部高级干部领导责任重大。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老干部高级干部更是经验丰富、独当一面的骨干。肩负重大责任的老干部高级干部唯有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才能不负党和人民所托。二是革命战争时期老干部高级干部知识文化水平亟待提高。“我们革命的世面将越搞越大,新环境、新事物会更复杂,没有真本领是掌握不了的。”^{[4]266}延安时期老干部高级干部多是工农干部,知识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远不能满足领导抗日战争的革命需要。应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复杂局势,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老干部高级干部“自己的知识又这样少,应该是‘加油’的时候了。”^{[4]90}三是摆脱经验主义的束缚。出身工农的老干部高级干部奋斗多年,经验丰富,但“必须懂得今天工作的复杂程度,如果只靠我们过去的经验去应付,也是应付不了的。”^{[4]253}经验丰富既是老干部高级干部的优点,也容易成为老干部高级干部的“包袱”。囿于之前的斗争经验,习惯于用已有的经验解决新问题,容易陷入经验主义窠臼。四是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团结合作的需要。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偏低,知识分子干部文化水平高。知识分子干部多是新干部。老干部多是工农干部。“你们没有文化,他们有文化;你们没有知识,他们知识很广泛,你们怎么同他们共事呢?”^{[4]266}文化水平低的老干部不要摆老资格,要加快加紧学习,后来居上。在陈云看来,老干部高级干部带头学习、模范学习是干部团结的重要保障。

(二)坚定学习自信

老干部要下定学习决心,“长期地有恒心地去学”^{[4]178}。陈云既反对“自高自大”的学习态度,又反对缺乏信心的学习态度。针对老干部畏难情绪退却心理,陈云辩证分析,老干部虽然记忆力减弱了,但相对于年轻人理解力强。只要坚定信心,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学好文化知识,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年不成两年,这样慢慢地学下去,就可以赶上来。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今天不懂明天就可以懂,应该有这样的学习决心。”^{[4]177}下定学习的决心、坚定学习的自信,来自老干部对学习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老干部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要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借鉴价值,要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意义。老干部对学习的意义认识越深刻,学习的决心就越大,越能克服学习的困难,坚定学习的信心。

(三)自学为主

上“长期大学”^{[3]183},以自学为主。老干部长期脱产进学校学习不切实际,应以自学为主,书本随身带着,用“挤”的方法争取时间去学习,从点滴学起,从基础学起,“老老实实地做小学生”^{[15]318}。老干部文化水平相对较低,陈云建议老干部随身带着《辞源》,多翻翻《辞源》,争取多识字,尽快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在基础文化知识提高的基础上,陈云建议老干部制定计划,用“钻”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本一本地读懂,既不懈怠,也不着急,每天坚持,读懂原文原意,不懂的认真请教。读的过程中,“要做笔记”^{[4]189},逼着自己反复阅读、独立思考,在消化书本知识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解。个人自学与集体研讨结合起来,“读书最好有个小组”^{[4]189},互相启发,共同进步。

建设学习型政党,领导干部是关键,老干部高级干部学习责任尤其重大。独立工作是选拔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准,善于学习是独立工作的必要条件。老干部高级干部有责任带头学习、模范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做好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

四、向群众学习向经验学习

共产党员“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6]523}。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解决问题要依靠群众,遇到“疑难不决的事情,要请教群众”^{[7]46}。陈云告诫党员干部,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人民立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人民“当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群众是最好的老师

学习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中国现实问题,是要把实际情况弄清楚。把实际情况弄清楚,一方面思想方法要对头,另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向群众请教。“每个共产党要随时随地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向群众学习。”^{[4]43} 思想方法对头,本身就蕴含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人民,就没有英雄。”^{[4]258} 人民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陈云一再要求领导干部将大量精力投入调研,深入基层一线,了解群众的意愿,倾听群众的心声,从群众的“土办法”中汲取智慧;要求各级党组织全面充分收集群众意见,“只有收集了群众的意见,才能作出很好的决定。”^{[4]169} 陈云特别强调,我们的工作,“不仅要依靠组织,更主要的是要依靠群众”^{[7]46}。我们解决群众的问题,必须到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答案。群众最真切地了解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讨论才能找出解决问题最切实可

行的办法。

(二)经验是最好的学习教材

革命时期,陈云建议把成功的领导经验和不成功的领导经验都写出来,大家对照成功经验和不成功经验,吸取教训,提高领导能力。我们的党员干部,“真的犯了错误,只要老老实实吸取教训,他的经验一定会增加,能力一定会提高。”^{[4]118} 向经验学习,不仅要学习领导经验,还要学习中国革命的教训。以党的纪律建设为例,陈云指出党的纪律建设的经验教训“证明了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4]139} 是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武器。这些经验教训要求党员干部自觉学习党章党规,提高自觉遵规守纪的意识。改革开放初期,陈云提出边试点边总结经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向经验学习绝不是停留在经验主义层面,而是要从经验中总结规律,把经验凝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再进一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

(三)学习借鉴他国经验

向经验学习,不仅要学习本国的经验,还要学习他国的经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陈云提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的经验,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应该注意学习苏联成功的经验。改革开放初期,陈云主张学习西方的现代管理技术和经验,运用这些现代管理技术和经验,使之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向群众学习、向经验学习,将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指明了学习的方向和路径。向

群众学习、汲取群众的智慧,为哲学思考提供养分;向经验学习、总结经验教训,为哲学思考提供历史镜鉴。学习哲学,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向群众学习、向经验学习,与学习哲学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共同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强大武器。

五、陈云学习观的现实启示

(一) 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履行学习责任,增强学习内驱力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16]300}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密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陈云始终坚持认真学习、带头学习,在繁忙的工作中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他人诲人不倦。陈云自己的读书笔记就有10多本,数千页,上百万字。陈云同志强大且持久的学习内驱力来自强烈的使命感,将学习作为对党和人民应尽的政治责任。“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如果搞的不好,四万万五千万人便不能很快解放,革命胜利会推迟多少年,人要多牺牲很多,那我们对不起老百姓。”^{[4]297} 领导干部的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陈云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学习,“从占用时间来说,学习是排在第一位的。”^{[17]76}“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18]310} 陈云同志以自己刻苦学习的一生践行初心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对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党员干部务必时时叩问初心、自觉担当使命,主动学习、善于学习,克服本领恐慌,提高干事创业能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二) 广大党员干部要弘扬理论联系实

际的学风,学以致用

要“把研究解决问题作为学习的着眼点,决不能坐而论道、凌空蹈虚”^{[19]143}。陈云运用学习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陕北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建国初期粮食紧张问题、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公私合营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财政经济平衡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宝钢建设问题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陈云始终秉持学以致用的学习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工作,将学习领悟的理论与具体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新时代新征程,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其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掌握好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二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问题,把解决问题作为理论学习的落脚点。三要搞好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环节,通过深入实际、下沉一线,真了解情况,了解真情况,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用实践来检验理论。

(三) 学习内容要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

党的思想建设必须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党内学习应根据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突出不同的学习内容。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夺取革命胜利是党的中心任务。陈云要求党员干部学习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掌握游击战、运动战等的规律,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初,尽快恢复国民

经济是党的中心任务。陈云要求党员干部学习经济知识和管理知识,了解和掌握经济建设规律,稳定经济秩序,稳步推动经济恢复发展。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是党的中心任务。陈云主张“向资本家学习”^[75],学习其先进的制造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推动公私合营顺利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任务。陈云要求党员干部在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还要“学习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必要的专业知识”^[732],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事业,面临着异常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发扬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和实践要求,不断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3]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陈云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列宁全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6]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 陈云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陈云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10] 朱佳木.论陈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3]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1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7] 刘家栋.陈云在延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18] 《缅怀陈云》编辑组.缅怀陈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19]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责任编辑:马俊

华中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过程中的 干部调配问题研究(1942—1943 年)

李格 黄志高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中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敌伪顽三方夹击的复杂局势,根据地生存状况日益严峻。为破解这一困境,华中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了精兵简政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关于干部调配的举措,其中包括干部调配前的解释动员、调配人员选定及调配后的合理安排。经过实践探索,华中抗日根据地干部调配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通过科学调配干部资源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政治智慧。

[关键词]华中抗日根据地 精兵简政 干部调配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下,各抗日根据地面临严峻的财政经济困难。为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于 1941 年底作出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华中抗日根据地亦积极实施精兵简政,并将干部调配作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学术界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有所关注,但成果多着眼于政策本身或主力部队地方化问题,而针对精兵简政中干部调配问题的研究相对薄

弱。本文拟从华中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过程中干部调配问题的提出、具体实施及成效出发,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干部调配工作进行探讨。

一、干部调配问题的提出

1940—1941 年,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军受制于兵力不足而暂缓进攻,转而提出所谓“巩固占领区”的任务,将矛头转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华中抗日根据地作为新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令日军坐卧不

收稿日期:2025-05-20

作者简介:李格,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黄志高,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安。同时,日军为掠夺战争资源,实现“以战养战”目标,更是高度重视富庶的华中地区,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展开频繁的“扫荡”“清乡”,实施“三光”政策。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后,更是积极推行“防共”“反共”方针,对新四军进行多重限制与封锁,敌伪顽三方夹击局面逐渐形成。面对华中敌后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及华中局意识到“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1]953},必须实行彻底精兵简政,干部调配问题也随之提出。

从军事方面看,日伪军调集兵力对华中地区发动季节性“扫荡”,后上升为分期分区“清乡”。1941年春,日军趁蒋介石集团发动皖南事变之际,对苏南、苏中等地区展开大规模“扫荡”。华中局根据敌强我弱的态势,依托华中水网丘陵地形,提出“应分散埋伏,打击敌人、伪军与土匪”^{[2]398},采用游击战术。游击战术的分散性迫切要求机构精简、人员缩编。新四军主力部队编制大、人员多,而主力中干部又占比较高,因此就出现“头重脚轻”的问题,不适宜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以新四军第二师为例,主力共15800余人,而干部总数为6292人,排以上的干部有2531人。为应对战局、适应战术调整及优化军事资源配置,华中局自1942年起逐渐推进“主力军地方化”,大批干部被派至基层岗位以加强县区武装或支援民兵建设,为持久抗战奠定坚实组织基础。

根据地组织架构上叠床架屋、头重脚轻的问题促使华中局推进干部调配。华中局一度对精兵简政有所犹豫,认为诸多职能部门仍处草创阶段,若精简机构,可能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但经调查发现,当时根据地党政机关中干部占比较高,头重脚轻问题确实存在,实行精兵简政、进行干部调配

势在必行。1941年5月,华中局指出盐阜区党委约2500名党员中干部多达330人。苏中区党组织中党员3676人,“成分百分之八十是半年来新发展的新干部”^{[2]365}。鉴于此,黄克诚提出,政治机关“应短小精干强而有力,不宜庞大浮肿”^{[1]165},上级机关庞大而下层无人工作的现象要尽快纠正,否则将影响根据地战斗能力的发挥。

华中抗日根据地干部群体中某些不良思想倾向及官僚主义作风,促使华中局决心实施干部调配。华中地区斗争形势复杂,战斗频繁,缺乏稳定的学习环境,很多干部未经系统理论培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不深。华中局认为,迫切需要“纠正不问对象高谈理论而与实际斗争脱节的现象”“克服干部教育落后于战士教育的现象”^{[1]159-160}。还有部分干部组织纪律松弛,存在“残余的官僚作风”^{[1]224}。少数老干部“表现失望,享乐情绪在增长”^{[1]423}。这表明,在敌后严峻的抗战环境中,单纯维持干部队伍数量规模已难以为继,急需通过调配干部开展培训学习,以提升干部素养、优化政治生态。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存困境,也是干部调配的动因之一。中共中央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2]323}。相持阶段,日军加紧了军事封锁与经济绞杀,切断华中根据地与外界的物资流通渠道。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发新四军军饷、停止供应弹药和物资。在此情况下,新四军军费、党政系统经费及根据地军民的基本生存物资,均高度依赖根据地民众供给支援。而干部队伍臃肿与根据地财力困难形成严重矛盾。1941年,苏中区党组织共3676名党员,其中区级脱产干部700余人,比例较高。1942年,

淮南路东根据地统计每个脱产者年花费约1100元,需20个群众供养,“鱼大水小”的状况令民众负担愈发沉重。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又使这种困局雪上加霜,1942年“华中各地因遭受水灾旱灾虫灾,以致许多地方发生春荒现象,许多贫苦群众无饭吃无种子”^[31]。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受害者十个行政区,人口在二十万人以上。全地区秋收平均不过二成到三成,有些区还不到一成”^[4245]。在根据地民力财富减弱的形势下,调配干部、节省民力成为改善民生、维持根据地存续的迫切任务。

二、干部调配的具体实施

精兵简政必然涉及人员去留与岗位调整,干部调配成为政策落地的必要举措。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指示:“精兵简政政策实行之后,干部必有多余,同时为准备将来,还应抽调干部一批并加以训练”^[2324]。次年4月,中央军委再次强调:“在干部的配备与使用上,是抽调上层,加强下层,务必配备适当”^[1947]。华中局立足敌后抗战实际,于1942年1月提出“实行必要的缩编,减少机关,充实连队,裁撤老弱,并抽出大批干部来加以训练”^[190]。9月,华中局与新四军分会联合发布通知,阐明干部调配的基本方针,“抽调一批有相当能力的地方干部到地方军及群众中工作”“抽调大批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党校、抗大学习,不得降级使用”^[1955]。至此,华中抗日根据地干部调配工作正式启动。

为打通干部思想、减少工作阻力,华中局在调配前进行了广泛动员。华中局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研究讨论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务必使全党全军知晓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的正确性。彭雪枫等人提出,地方党政机关及部队要向情绪不满的干部积极解

释,表达关心并分配合适工作。新四军第二师司令部要求各团先后召开排以上及党内支委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政治动员和政策解析,会议次数为一至两次。多数干部在深入了解中央精神后,认识到精兵简政是充实主力、增强战斗能力的有效举措,便予以积极响应。

为应对复杂局势、谋长远发展,华中局在前期动员后,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进干部调配工作。其一,将政治立场坚定、工作能力过硬的副职干部与编余干部调配充实至基层。军队干部调配方面,主力部队干部优先担任地方军及群众武装的领导、骨干。1941年11月,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人民武装力量以扩大、巩固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为中心,主力军实行精兵主义。对此,新四军同步推行了“主力部队地方化”的战略转型。1942年2月,陈毅强调主力部队应选拔优秀干部到地方军去,纠正输送干部时的错误倾向。8月,第二师司令部报告显示,干部中副职取消,共调配军政干部76名。次年,华中局指示:“编余干部应妥为处理,大批派到下层去,到群众中去,到生产中去”^[143]。第一师即“派遣干部及主力之战士及党员加强民兵骨干,以加强其领导”^[1302]。在游击战争愈发重要的形势下,新四军主力部队力求精干,抽调干部来充实地方武装,使其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地方党政机关亦通过干部调配以优化资源配置,促成上层干部向下层组织的有序流动。1942年底,苏中区党委声明:“编余人员应分别处理,区级以上干部送区党委或行政公署另行分配工作,区级以下干部送地委或专署,在指定机关学习”^[5371]。淮北根据地的干部精简堪称模范,通过成立

边区精简委员会,组织干部开展“精简效能研讨会”,系统总结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等问题,研讨各项工作中的新方法新思路以提升干部的工作效率。通过两次精简共调配干部100人,其中35名干部充实下层机关,8名干部转任小学教师以加强基层教育工作,6名干部调至地方去组织群众生产。地方干部的调配工作既为干部提供了靶向性的适配岗位,又破解了机关庞大、人浮于事的困境,推动华中抗日根据地干部队伍的可持续发展。

其二,抽调政治理论素养不高的军政干部至抗大或党校接受培训,以提升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1942年初,刘少奇指出各根据地与华中局党校应扩大招生、延长课时,加强马列主义学习与党性教育,这就为干部调配后的集中学习提供了良好契机。李先念提出解决干部问题的办法,即一方面启用地方先进分子,“一方面各县送大批的学生到抗大受训,毕业后仍回当地”^{[1]617}。受此影响,第五师调配“大批干部到抗大十分校工作,训练连、排干部”^{[1]671}。如此,既通过干部集中管理降低行政成本,又形成学校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为下一步的革命战争储备人才。

其三,从军事斗争与人才保护的需要出发,将不适宜打游击的部分干部转移调配至后方保留培养。第一,老弱伤病、妇女及文化干部等调至后方。1942年,陈毅等人指出,日军将加强沿江控制,为适应斗争形势,“新由上海来的大批知识分子、妇女等尽可能送军部”^{[1]189}。次年初,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地区应将老弱伤病及妇女干部送至延安,参与生产工作。第二,军工、通讯、医疗等领域的专家及技术骨干转移至后方,实行人才保护性调配,以高效施展其专业特

长。需注意,调配至后方的干部“应该是政治上纯洁的”^{[1]38},以防范对后方政治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此举既规避了敌后斗争对人才的损耗,又推动战略后方的技术研发与人才培育,为持久抗战储备人才。

其四,抽调部分干部打入伪军或进行秘密工作。陈毅等人为坚持苏中斗争,决定“抽一批干部到伪军内部工作”^{[1]209}。新四军第一师司令部强调“对伪军、伪组织以建立下层基础为主,并派够格党员首先打入有条件有作用的地方土著伪军及伪组织中心生根”^{[1]272}。精兵简政中的干部调配为开展敌伪军工作提供契机,通过选派政治可靠、有社会关系可利用的党员干部打入敌营,建立“下层关系网”,为此后瓦解伪军打下基础。

三、干部调配的成效

华中局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干部调配工作有效落实,至1943年基本完成并见成效。淮海区党委委员金明指出:“‘扫荡后’,切身感到中央精简政策的正确”“彻底的加强下层……工作已有不同的发展”^{[1]473}。

其一,干部调配的最突出成效是上层机构得到精简、基层力量得以充实。1942年10月,第四师已“减少营以上的指挥机关八个”^{[1]526}。次年初,陈毅在汇报时讲到,军直机关经四次精简,单位从16个减至9个,人数从3884人减至1803人。与此同时,大量机关干部充实到基层,地方武装力量得到明显加强。第一师四分区“主力精简了二千余人去作民兵的骨干”“在全苏中来说,则有六千多人精下民兵中去”^{[1]291}。第二师四旅调走政治干部30名、军事干部46名,淮南西分区减少干部共85名。第四师调配151名干部充实地方武装,9名送至地方机关。

主力干部到地方后,既灵活、高效打击敌人,又发挥“传帮带”作用,将主力军事训练引入地方,规范训练与教学;同时以主力军作风为标杆,扭转地方武装的散漫习气,增强其战斗意志和执行力,使其在抗战中发挥更大作用。

其二,干部调配后的学习与整训,实现了干部理论素养的提升、实践能力的锻造。第一,被调配干部依托抗大、党校等教育平台,接受军政双修式系统培训,课程涵盖党的政策、战略战术及实操训练。1944年,赖传珠在报告中提出有超过90%的干部接受过培训,部分干部受训两至三次,干部理论水平大幅提升。第二,组织改革后,部队开展教育整训,建立健全文化教育制度,干部文化素养普遍提高。第二师十八团进行37次作文写作,“消灭干部文盲十七、八名,其他各独立团干部文化已普遍提高,学习情绪都很高”^{[1]353}。经过教育培训,第二师中未读过书的干部只占干部总数的21%。第五师“各旅、各军分区均开办教导队,团开办短训班,培训班、排干部及医务,军需,参谋,轻重机枪、枪榴弹射手等人材”^{[1]671}。干部文化素养的提升直接推动军队作风的转变,军队革命面貌焕然一新。1943年初,陈毅汇报指出各区“工作作风有着进步,对执行命令亦较坚决,一切制度较前健全”^{[1]1003}。

其三,干部调配的深层价值体现为民众负担显著减轻、干群关系切实改善。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6]511}。1942年9月,

彭雪枫指出:第四师减少伙食单位29个,共减人员806名,其中干部291名;第四师已节约经费608314元,成效显著。通过干部调配,华中地区“鱼大水小”的问题逐步解决,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日益减轻。同时,随着调配工作的推进,大批主力干部融入群众武装,同人民并肩作战,还有部分地方干部充实下层、转任人民教师或组织群众生产,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日益改善。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3[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3]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档案馆.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第2卷[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 [4]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 [5]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档案馆.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第1卷[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
-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马俊

雨花英烈精神引领大学生志愿服务的路径探索

吴星星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江苏 南京 211300)

[摘要]雨花英烈精神以其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为主要内涵,与大学生志愿服务在价值追求、责任担当与实践品格上深度契合,体现在两者具有精神动力的同源性、使命传承的连续性、行动逻辑的契合性。从思政课堂、校园文化、馆校合作这三个方面入手,推动雨花英烈精神内化为大学生投身志愿服务的深层动力与行动自觉,引导大学生在奉献中坚定信仰,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关键词]雨花英烈精神 大学生志愿服务 路径

雨花英烈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与革命文化,其蕴含的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具有独特而深厚的感召力。雨花英烈精神是新时代铸魂育人的宝贵资源,为培育大学生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提供了精神沃土。青年大学生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以雨花英烈精神引领大学生志愿服务,能够为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

一、雨花英烈精神的主要内涵

(一)崇高的理想信念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雨花英烈精神中首

要的、最基础的内涵,其展现的是雨花英烈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建立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洞悉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是建立在对我国苦难现实的痛彻体悟和对光明未来的热切向往之上的价值选择。邓中夏在狱中面对敌人威逼利诱时慨然宣告:“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1][96]}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正是其理想信念坚如磐石的生动写照。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我身上的磷,只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

基金项目:2024 年度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课题“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雨花英烈精神立德树人的实践创新研究”(立项编号:2024SJSZ0106)。

收稿日期:2025-05-20

作者简介:吴星星,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助教。

诞生一个新中国。”^{[2]632}正是这种超越个人生命价值的崇高理想信念,赋予了雨花英烈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畏强暴、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

(二)高尚的道德情操

道德情操是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境界最直接的反映^[3]。雨花英烈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优良品格的生动展现,集中体现在严于律己的党性修养、真挚深厚的同志情谊以及安贫乐道的崇高境界。这种高尚情操,是理想信念在个人品德层面的具体化与人格化。恽代英一生克己奉公,生活极其简朴,却将大部分收入用作党的活动经费或资助困难同志,彰显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本色。李得钊被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迫害致死。雨花英烈们的光辉事迹表明,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其理想信念的坚实支撑。

(三)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雨花英烈精神最撼动人心的内涵体现。“一个人如果能为最多数的中国民众的利益、为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虽死犹生。”^{[4]560}雨花英烈的牺牲精神是基于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基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崇高使命感的自觉选择,深刻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郭纲琳在狱中严词拒绝在“悔过书”上签字,她将一枚铜板磨成心形,镌刻上“永是勇士”四字,表达宁死不屈的决心。郭凤韶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屠刀,她毫无惧色地高呼革命口号,其昂扬无畏的气概令敌人受到巨大震慑。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彰显着雨花英烈们对自己生命的伟大超越、对信仰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

二、雨花英烈精神与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内在关联

雨花英烈精神所蕴含的理想信念、责任担当、无私奉献、顽强斗争等核心要素,为大学生志愿服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而大学生志愿服务则为当代青年传承雨花英烈精神提供了生动的实践平台。雨花英烈精神与大学生志愿服务在精神动力、使命传承和行动逻辑这三个维度高度契合,深入剖析两者的内在关联,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引领青年大学生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精神动力的同源性

雨花英烈精神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大学生志愿服务奠定了深厚的价值根基。雨花英烈精神启示着当代青年,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志愿服务正是这种结合在和平年代的生动载体,是将家国情怀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爱国和奉献行动的重要途径。深入学习雨花英烈精神,有助于大学生深化对志愿服务崇高价值的认知,将从事志愿服务视为传承红色基因、担当时代使命的必然选择。

(二)使命传承的连续性

雨花英烈精神昭示着,青年的命运从来都与时代紧密相连,担当使命是每一代青年的本色。雨花英烈们的担当奉献品质是激励当代青年大学生的精神力量,青年大学生有担当的品格亦是志愿服务持续性开展的不竭动力^[5]。尽管时代主题已从“救亡图存”转变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但服务人民、奉献国家的本质要求一脉相承。雨花英烈精神激励着大学生在社会服务的实

践中挺膺担当,而志愿服务正是大学生回应时代召唤、履行社会责任、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的具体行动。

(三)行动逻辑的契合性

雨花英烈于艰险境遇中所展现的坚韧意志与顽强作风,为当代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提供了榜样引领和行为范式。雨花英烈精神昭示着,要实现理想、履行责任,必然会有困难与挫折。学习雨花英烈们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能够帮助大学生在志愿服务中克服畏难情绪、增强抗压能力,不断提升解决问题的本领。

三、雨花英烈精神引领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具体路径

(一)以思政课堂为阵地,强化大学生志愿服务意识

其一,深度融入教材体系,实现精神内涵的学理浸润。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将雨花英烈“为信仰献身”的忠诚品格与“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人生追求建立深度联结,阐明其内在一致性;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相关章节,着重阐释雨花英烈精神作为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赓续,赋予志愿服务以传承红色基因的时代意义。通过系统化融入,使雨花英烈精神得以超越单一历史叙事,成为涵养志愿服务精神的价值坐标。

其二,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促进价值认知的情感升华与内化。摒弃单向灌输,运用案例教学法,精心选取邓中夏、恽代英等英烈真实感人的斗争事迹,以震撼学生心灵、激发情感共鸣。引入问题导向式研讨,围绕“志愿服务何以成为传承雨花英烈精神的时代载体”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推动学生将外在精神感召内化为服务奉献的行动自觉。开展情境体验式教学,如模拟历史场景、进行角色扮演等,可有效消解学生对历

史的时空疏离感,使学生在“共情”中深化对雨花英烈精神的理解认同,进而筑牢投身志愿服务的价值根基。

其三,强化实践导向设计,引导认知向行动的初步转化。课堂教学不能局限于认知层面,更需搭建通向实践的桥梁。设计具有行动指向性的课外作业,如“基于雨花英烈精神设计社区志愿服务方案”,引导学生积极、深入思考志愿服务的精神内涵与实践路径。在课堂关键节点,组织学生集体宣誓或签署志愿服务倡议书,通过庄严仪式增强使命感,实现从认知到情感再到意志的统一,为后续参与志愿服务实践奠定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

(二)以校园文化为依托,丰富大学生志愿服务形式

其一,营造浓厚主题氛围,实现雨花英烈精神的日常浸润。充分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如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组织学生前往雨花台或其他红色纪念场所举行庄严的缅怀仪式、开展主题党团日活动等,强化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定期举办“雨花英烈精神文化周”活动,依托英烈事迹主题展览、红色情景剧展演等多种形式,使雨花英烈精神具象化融入校园文化场域。举办“雨花英烈精神与青年担当”主题论坛,邀请学者与优秀志愿者对话交流,深化对精神传承与志愿服务的时代价值认知,营造崇德向善的校园文化生态。

其二,树立先进志愿典型,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着力发掘、培育和宣传在志愿服务领域表现卓越的学生个人及团队典型,聚焦志愿服务中践行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精神,深挖其与雨花英烈精神内核的契合点,以鲜活事例传递信仰力量。设立校级“雨花志愿服务之星”专项荣誉,对表现突出者予以表彰并大力宣传,定期开展

优秀志愿者事迹报告会,借助青年榜样的真切讲述,具象化呈现志愿服务精神,持续激发大学生群体的参与热情与价值认同。

其三,打造品牌服务项目,搭建精神引领的实践平台。成立“雨花薪火”红色宣讲团,选拔学生志愿者深入大中小学、社区、企业,讲述英烈故事,弘扬革命精神。组建“红色印记”实践寻访团,利用假期组织团队寻访英烈足迹、调研革命遗址,形成丰富的传播成果。将常态化志愿服务项目深度融入“青春奉献新时代”主题,彰显其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深刻内涵——这正是雨花英烈为民情怀在当代的生动践行。

(三)以馆校合作为平台,拓展大学生志愿服务渠道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作为雨花英烈精神的重要传承载体,通过馆校深度合作,能够为大学生构建权威、专业、沉浸式的志愿服务实践平台,实现精神传承与能力提升的双重效果。

其一,共建实践教育基地,实现资源共享与机制协同。高校与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挂牌建立“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志愿服务示范基地。利用场馆、遗迹、故事、人物等要素开展启发式、体验式、浸润式教学^①,并共同研发契合大学生认知特点和教育目标的深度解说词、专题研学课程等,以提升教育精准度。将大学生在纪念馆参与的各类学习实践活动系统纳入学校“第二课堂成绩单”学分认证体系,并建立长效机制以提升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其二,创设核心实践岗位,提供沉浸式历练与价值体悟平台。在纪念馆内设立常态化、专业化且富有挑战性的学生志愿服务核心岗位:一是社教活动助理岗,参与纪念馆主题展览策划布置、教育项目设计与

执行等,锻炼学生志愿者的组织、策划与执行能力;二是一线公共服务岗,在重要纪念日与客流高峰时段承担人流疏导、咨询答疑、暖心帮扶等工作职责,传播正能量、彰显志愿精神。

其三,协同开发特色资源,赋能高校育人体系。馆校联合开发系列微课程,聚焦馆藏珍贵文物,深度解读其承载的精神密码。共同编撰《雨花英烈精神与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指南》,系统整合精神解读、典型案例、服务指南,为青年志愿者提供全程行动导引。合作策划“雨花英烈精神校园巡展”,打造高校定制版主题展览与情景短剧,推动纪念馆资源精准输送,让红色基因浸润高校校园,持续增强雨花英烈精神的感召力。

参考文献:

- [1]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等.雨花魂[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 [2] 中央档案馆 中国革命博物馆.恽代英日记[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 [3] 管建莉.雨花英烈精神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J].教育观察,2019(20):14-15.
- [4] 邓中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5] 彭佳姝.探赜雨花英烈精神滋养大学生志愿服务的价值和路径[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下旬刊),2021(10):164-166.
- [6] 林心杰,张雪薇.效用、条件与路径:雨花英烈精神融入高校育人实践研究[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21(5):36-40.

责任编辑:马俊

“创新安徽,何以进阶?”等六则

创新安徽,何以进阶?

春日江淮,一路繁花,科创潮涌。4月26日,第三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以下简称“科交会”)在美丽的巢湖之滨拉开帷幕。本届科交会吸引了海内外两千多家企业和近两百所高校院所参展,首发首展科技成果占比近30%。

从新能源汽车的产销两旺、到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从低空经济的场景拓展、到量子科技的最新转化……近年来,安徽省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不断擦亮“新兴工业大省”的“新”成色。

从科技创新起笔 点燃发展新引擎

“悟空,你好!”当一位观众向屏幕中的“孙悟空”提问后,只见身穿西瓜裙、手拿金箍棒的“AI孙悟空”腾云驾雾现身及多模态交互等技术能力,为游客提供幽默问答和智慧导览,获得全球观众点赞。

今年出台的《安徽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行动方案》中提出,安徽将围绕“人工智能+”建设,实施底层强基、融合应用、生态构建、安全筑底四大专项行动,争取到2027年,通用大模型性能居全国前列,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当前,安徽正以“人工智能+”为支点,撬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的双重变革,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创新引领,塑造汽车产业新生态。在近日开幕的上海车展上,奇瑞集团携53款车型亮相,实现了燃油、混动、纯电全动力形式覆盖。而在前不久举办的奇瑞汽车智能化战略发布会上,奇瑞还集中展示了猎鹰智驾、人形机器人、智舱大模型等

技术成果。

往高处攀,向新处闯。安徽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汽车产业创新发展需求,持续技术攻坚,加快打造全球汽车技术研发集聚地,建设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今年一季度,安徽汽车产量76.2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37.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2%、83%,总量居全国第一。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安徽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全省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六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量子科技、先进核能、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抢滩布局,初显集聚效应。一批新的增长点、增长极正加快孕育。

于产业创新着墨 闯出发展新天地

走进零重力飞机工业(合肥)有限公司,一个写有“构建地球上第三种交通生态”的标识牌醒目地矗立在企业办公区的一侧,彰显出这家企业宏大的愿景。落户合肥两年多来,这家以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为核心,布局多样化新能源航空器的企业,快速在国内电动航空领域脱颖而出,产品研发和商业化落地稳步推进。

“合肥拥有雄厚的先进制造业基础优势,科创属性强,具有支持低空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和营商环境,各级政府部门给予我们非常大的资源支持。我们将在推动航空产业绿色革命及先进空中交通的发展上持续深耕。”零重力飞机工业联合创始人石红坦言。

“创新+产业”同频共振,迸发澎湃动能。2024年,作为工业移动操作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优艾智合在获得合肥东城产投C轮投资后,将总部迁到肥东,计划在合肥建设研发中试基地,重点攻关人形机器人、极端环境作业系统等前沿技术。今年3月,企业与西安交通大学联合创立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对外发布了人形机器人矩阵,

针对不同场景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

在优艾智合生产车间,形态各异的工业移动机器人,利用高精度同步定位与建图融合导航技术灵活穿梭、高效协同完成任务。在产品调试区,一台移动搬运机器人缓缓伸出手臂,将重达数十斤的晶圆盒精准放置在电子货架上,整个搬运过程实现了零损耗。“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今年10月份,工程师们正争分夺秒保障生产。”优艾智合首席运营官孙梦介绍。

合肥市把智能机器人产业纳入“6+5+X”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体系,已拥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156家,涵盖核心部组件企业 and 人形机器人整机集成企业,初步形成了“大脑—小脑—核心部组件—本体”的研发制造一体化格局。

近年来,安徽省聚焦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树林变森林”、未来产业“小树变大树”,扎实推进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来产业培育壮大两大工程,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机制创新谋篇 激活发展新动能

4月26日,在安徽合肥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上,全国科技大市场联盟正式揭牌。该联盟由安徽科技大市场联合中国技术交易所、上海技术交易所、东北科技大市场等15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旨在推动跨区域技术交易、成果转化与资源共享,构建全国一体化技术要素市场体系。

全国科技大市场联盟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联盟将共同助力科技成果“破茧成蝶”,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强劲动能。

依托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安徽不断完善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在合肥科学岛,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已服务国内外200多家用户单位,支持超过3800项前沿研究课题。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大科学装置建设,目前在超导、磁体、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院、大健康研究院、数据空间研究院和环境研究院组建以来,发挥了创新链中“从1到10”关键环节作用,已逐步成为中国科大、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以外的“科创第三高地”。今年已面向

经济主战场,研发工程样机、软件等80余项。累计转化科技成果100余项,孵化、引进企业80余家,其中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4家、省专精特新企业6家。

设立“科大硅谷”海外创新中心招引全球创新资源;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商学院,培育懂科技、懂产业、懂创新、懂资本、懂管理的“五懂人才”;成立多部门联合的产业专班,以全新的组织方式发展新兴产业;围绕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健全“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努力造就更多高科技、高性能、高质量的“金娃娃”……安徽不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把科技创新势能更多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科技创新领先一步,产业创新领跑一路。安徽区域创新能力连续13年保持全国第一方阵。今年一季度,安徽省地区生产总值1226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0.1%。

“依托创新资源优势和新兴产业发展基础,安徽正在着力实施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努力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未来技术策源地、未来场景应用地和未来产业集聚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作者:汤阳、李东标;来源:新华网,2025年4月)

科技成果转化堵点怎么破 ——来自安徽的调查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面临不少堵点、难点,这是一项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工程,需要思想破冰、制度破局、人才破题协同发力。安徽近年来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等方面大胆探索,通过积极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不断完善人才评价体系等,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通过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企业孵化平台、着力优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举措,营造创新创业良好生

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进程,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撑。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科技成果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源泉,推动其成功转化落地,对于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安徽深挖地方科教资源,坚持以试点推动改革,加快构建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围绕“不敢转、不能转、不想转、不会转”全面发力,着力加快破除体制机制不通、供需对接不畅、要素保障不足等一系列难题。数据显示,2024年安徽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达5929.86亿元、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达4312.53亿元。2025年2月5日,安徽“新春第一会”——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在合肥召开,再次提出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上闯出新路,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

解决“不能转”问题

早在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就提出,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等事业单位与生产企业相结合,联合实施科技成果转化,但落地执行难度很大。这是由于科技成果所有权一般属于单位,科研人员只能获得短期使用权。“缺少权属支撑,科研人员转化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安徽创新馆成果转化处负责人胡金霞说。

2016年,我国提出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为科技成果权属改革持续松绑。在一系列改革中,安徽不断创新模式方法,积极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工作。2022年,安徽省提出在赋权改革试点单位开展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试点。安徽省科技厅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处副处长刘沛沛表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多为公立事业单位,其科技成果赋权往往涉及国有资产使用、处置。可以说,这项改革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

“科技成果转化往往涉及国有资产转让、增持、退出等行为。若没有制度保障,就像未经允许拿着别人工具干活,心里总不踏实。”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晋晓峰说,他即将和安徽伊普诺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新公司,转化其获得创新创业大赛奖项的“便携式多参数疾

病标志物快速检测平台”项目,但遇到了难题——国有资产收益如何分配?万一出现损失谁来承担?

安徽大学国内合作处副处长刘泉介绍,该校出台办法,在不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及关键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将科技成果从国有资产管理体中剥离出来单列管理,从制度上解决科技成果“不能转”问题。“现在这项科技成果已经赋权给我们团队,我们将和学校按80%、20%的比例分配收益,并承担相应责任。”晋晓峰说。同时学校还提供科技成果转化咨询支持、配套产权保护、公司股权结构建议、投资对接等相关服务,减少研发团队后顾之忧。

刘沛沛表示,通过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安徽优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流程,理清科研单位对国有资产管理决策等权责,缓解了科研人员不能转、科研单位不敢转的尴尬局面。

尝试赋权改革新路

2023年10月份,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第二批典型案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推出的“赋权+转让+约定收益”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模式作为安徽唯一案例入选,并向全国推广。“在这种框架下,科研团队利用赋权的科技成果全部作价投资,单位不持有其中任何股份,但可通过转让协议享受知识产权未来收益。”刘沛沛说。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许可、转让等科技成果转化方式较为常见,成功率更高,作价投资等转化方式却不尽如人意。胡金霞认为,作价投资、合作转化等方式涉及多方权责关系和利益分配,较为复杂。因此,改革堵点、难点集中在该领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学院副教授、合肥中科采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平说,作价投资等转化方式需要科研人员深度参与。“对科研人员而言,科技成果转化路径普遍较长,需要大量投入,难度高,见效慢,种种‘鸿沟’让人望而却步。”

作为信号探测领域的专家,曹平在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有不少技术成果。“我们很早就和企业有过合作,专门从事高精尖海洋物探装备的关键技术研发,还做出了样机。”曹平说,“但科技成果处置掣肘多、审批流程极其繁琐,各方容易反复‘拉抽屉’,导致成果一直难变现。”

2021年3月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为国家

级试点单位,在安徽省率先探索“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模式。2021年8月,曹平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提出赋权申请,短短2个月就完成了审批,并于2021年年底成立合肥中科采象科技有限公司,成为首批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企业。“按照赋权改革协议,我们获得了100%的科技成果所有权,为后续科技成果灵活处置提供了条件。”曹平说,“我们可以拿着赋权后的成果去找金融机构、合作企业,解决资金、人才等问题。”

不久前,由合肥中科采象提供技术支持的中国海油海洋拖缆地震勘探采集装备“海经”系统,顺利完成在深度3000米以上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作业,并发布我国首张超深水三维地质勘探图,助力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拥有全套海洋地震勘探拖缆采集装备研制能力的国家。截至目前,该公司市场估值近4亿元,累计合同额超过2亿元。

刘沛沛认为,这在保障国有资产合理收益同时,规避了单位直接办企业的风险,提升了审批效率。另外,研发团队持股后,不仅处置更为灵活,还可以通过股权享受企业发展带来的收益,有效提高成果转化积极性。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一系列特色举措不断涌现。安徽工程大学针对不同科技成果转化模式采用了不同激励机制,在该校赋权试点方案中,相较于转让、许可等转化方式,作价投资实现收益的分配比例要高10%,以促进科研人员长期跟进科技成果转化。安徽医科大学大胆探索“先试后买”模式,对于技术成熟度不高的成果,允许企业先试后买或实施期权许可,推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助力跨越“死亡之谷”

创新创业有一套著名的“死亡之谷”理论,即将一项科技成果转化为一项创新产品,需要跨越数道风险极大的鸿沟,这一阶段被称为“死亡之谷”。不少技术成果正是在此折戟,难以顺利抵达产业化终点。

“科技成果可以通过实验室验证,但创新产品更需要市场检验。”合肥工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教授张贤文表示,作为一名新能源动力与储能技术领域专家,他对科研工作非常熟悉,但对运营企业并不擅长。

2023年,通过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张贤文与人合作创立安徽熊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用于电池负极的硬碳材料研发生产,刚起步就

遇到了困难。“企业需要长期稳定、面向市场的专业团队,而老师学生很难有多余精力搞市场。企业还需要合适的办公经营场所,光有实验室远远不够。”张贤文回忆说,“刚开始大家甚至‘游击式’办公,学校图书馆、咖啡室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

为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2023年,在合肥工业大学、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政府等多方密切合作下,“工大智谷”正式成立。“合肥工业大学提供用地等硬件资源,合肥包河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整体服务等软件要素,让我们不仅可以拎包入驻,还能享受资金、人才等优惠政策,极大缓解初创企业生存压力。”张贤文说。

记者在“工大智谷”看到,一条微型电池生产线正井然有序地运行。步行上楼,干净明亮的办公室让人心情愉悦。张贤文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实现小规模生产,2024年销售额超过200万元,后续将开展大规模量产。作为企业孵化器和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工大智谷”坚持校企联动,聚焦智能制造、智能系统、智能装备、智能网联等新兴领域,利用高校、政府及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等资源,提供行政综合服务、创业辅导、场景应用支持以及种子基金投资等全方位企业服务,持续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安徽全力做好配套服务保障,通过建立新型研发机构、科技企业孵化平台,着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截至目前,安徽拥有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219家,其中国家级67家。

很多科技成果之所以难跨“死亡之谷”,还在于缺乏对产业价值的认知。胡金霞说,“办企业和搞科研不一样。科研人员可能觉得技术搞出来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实际上,某项技术是否真正具备产业价值、是否能形成商业模式,都要经过市场检验”。

当前,很多科技成果普遍面临技术成熟度不高、应用场景不清晰、市场客户群体不聚焦等问题,很多科研人员对产业链上下游、行业法律法规、商业运作等缺乏了解,科技和产业成功衔接难度非常大。2022年,一项名为“技术经理人”的新职业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所谓技术经理人,是指具有良好技术背景、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能够辨识科技项目技术水平和应用场景,帮助科学家寻找合适合伙人的专业人员。刘沛沛认为,与

其让不擅市场的科研人员补课，不如专业事交给专业人。“通过积极培育专业从事技术转移人才，我们将科研院所和市场产业联结起来，有效促进了科技与产业双向奔赴。”

近年来，安徽全力打造“科技大市场”，为科技成果供需对接提供平台，同时不断优化技术经理人队伍。2022年，安徽在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系列中特别增设技术经纪人类别。2023年，安徽省技术经理人协会正式成立，为技术咨询服务、技术经理人培训、技术转移信息平台搭建奠定基础。2024年11月份，《安徽技术经理人佣金收取指导意见》发布，推进了安徽省技术经理行业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截至目前，安徽拥有3000多名技术经理人。

衔接人才评价机制

当前，安徽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高规格推动政策体系持续完善。通过政策引领、制度搭建、生态优化等多项举措，强化审计、财政、人社等多部门联动，为科研人员全面解除科技成果转化的后顾之忧，助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随着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对科技成果转化逐渐从数量要求转向质量要求，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当前，高校等科研机构主责主业依然是教书育人，科研人员面临职称评审、考核评优等工作压力，评价体系偏重学术导向，导致科研人员需要在“拿帽子”和成果转化上做取舍。

安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与心理科学学院副教授季公俊表示，这些年学术界竞争激烈，若找不到现实问题和学术研究的契合点，容易陷入既做不好科研、也完不成转化的窘境。专业人士认为，科研人员陷入两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评价体系不够完善，要从根本上扫除科技成果转化障碍，关键在于推动人才评价体系与时俱进。

据了解，安徽部分高校逐渐将科技成果转化纳入人才工作评价机制。安徽医科大学着力修订完善成果转化绩效导向的人才评价制度，在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聘任、项目评审等方面加大成果转化绩效权重；安徽工业大学要求新入职教师深入企业一线，感受技术实践；安徽科技学院将科技成果转化实效列入目标管理考核指标。“破解‘不想转’难题，需要着力从制度出发，建立更为完善的激励机制，发挥好制度‘牛鼻子’作用。”刘沛

沛说。

2023年12月份，安徽省科技厅发布《安徽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提出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相关人员的聘用和岗位管理机制，根据科技成果转化和专业服务人员的人才特点，分类建立聘期考核等机制。同时，着力优化职称评审体系，为科技成果转化人员单独设置标准条件。刘沛沛说，“我们将横向课题纳入评价体系，对于经费超过30万元的横向课题，在经过企业验收、系统申报后，可视同安徽省科学研究项目Ⅲ类课题，含金量等同于1个省科技重大专项”。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对此表达担忧：将科技成果转化纳入职称申报条件同台评审，固然可以激励科研人员做好科技成果转化，但确实也有部分学科难以实现产业价值。专家指出，若能专设相应的职称评价制度，将其与现行教授、研究员等职称序列区分开，可以很好缓解这类矛盾。在这种模式下，通过扩展科研人员评价体系方式，技术成果转化学者可以弱化论文数量要求，同时强化新技术、新工艺等专利成果要求。全新评价方式，能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多选择。

（作者：梁睿、李思隐；来源：《科技日报》2025年4月）

安徽科创，何以攀峰

又到了一年春夏之交，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第三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在此举行。海内外两千多家企业、近两百所高校院所参与，对接金额破千亿元，成为一场创新链对接产业链的盛会。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

2025年开年以来，安徽这个地处长三角和中西部交汇点的科技大省，科创动能持续喷涌：“人造太阳”创造“亿度千秒”新世界纪录，实现我国聚变能源研究从基础科学向工程实践的重大跨越；“祖冲之三号”问世，再创全球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在集成各种现代技术的汽车产业领域，安徽省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产量一季度均跃居全国第1位，实现历史性跨越……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全国科技创新版图

中,江淮大地有何不同?安徽科创何以攀峰?

加速攻“尖”,前沿成果密集上新

4000 余项科技成果,“摆”进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约 2 万平方米的展区,创科交会举办以来历史新高。

不远处,形如“原子裂变”的安徽创新馆内,去年“上新”100 多件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前沿技术和产品,馆内展品总数超过 2400 件。

伴随着进入“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皖字号”科技成果正聚沙成塔,加快攻“尖”。

数据显示,2024 年安徽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 2.69%,居全国第 7,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安徽区域创新能力连续 13 年保持全国第一方阵。

攻“尖”的动力,离不开安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高地拔节起势。

“祖冲之三号”量子计算原型机问世,再创全球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人造太阳”创造“亿度千秒”世界纪录,实现从基础科学研究迈向工程实践的重要进展,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加速建设,商业化进程走在国际前列;自主研发的“天都”试验星实现我国首次绕月编队飞行,推动我国在近地小行星防御、深空通信等领域形成自主技术体系。

攻“尖”的底气,来自高能级创新平台的竞相涌现。

安徽积极承接国家重大科技发展战略布局,挂牌成立全国首个国家实验室;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能源、人工智能、大健康、环境、数据空间五大研究院。

在人工智能研究院,合肥网仪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新平正在与团队进行高端网络测试仪的研发,设备研发成功后,能够为网络数据安全高效传输提供保障。

位于合肥滨湖科学城西北角的大科学装置集中区,几年前还是一片杂草丛生。如今,“合肥先进光源”同步辐射装置、大气环境立体探测实验装置等 8 个项目正加快建设。建成后,这里将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大科学装置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目前,安徽已建、在建和预研大科学装置 13 个,建成各类“国字号”创新平台 200 余家,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重要省份。2024 年,安徽获批全国重点实验室 15 家,总数达 23 家、较重组前接近翻一番。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

处长钟海斌说:“瞄准国家战略和安徽发展所需,按照同体系、抓重点、强能力、重贡献的要求,重塑升级创新平台体系,支撑和引领安徽新质生产力发展。”

攻“尖”的抓手,在于加快核心技术攻关。

记者走进位于科大硅谷的合肥知冷低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对极低温稀释制冷机进行组件安装。“这是量子计算等高端科技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核心设备。”公司董事长王绍良说,他们研发的 ZL-DR400 型极低温稀释制冷机相关技术指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接到国内外 60 多个科研院所的意向订单。

漫步在科交会科大硅谷板块,能看到不少“黑科技”产品:瀚海量子的未来实验室 VR 游戏、未来头显的宇宙之旅 VR 大空间、宇翼科技四足机器狗……今年科交会,科大硅谷共征集展品 87 件,首发首展 23 件,其中展品 89%达到国内领先及以上水平。

2024 年,安徽省拥有高价值发明专利达到 6.86 万件。其中,近一半的高价值发明专利分布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些核心专利已带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智能网联等多个产业实现关键技术突破。

打通堵点,“链”变带来产业“聚变”

安徽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等方面大胆探索,着力破解科技成果转化“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努力让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咬合,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赋权改革”激活转化动能。

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合肥中科知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带领团队对公司自主研发的电磁 AI 技术设备进行调试。“通过这个小设备,不需要佩戴电极,也不需要去除衣物,用户就能无感完成心电图监测。”公司总经理张冬说。

该公司的核心技术源于中国科大智能感知实验室,是中国科大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的受益者。这项改革采取“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新模式,把试点单位的所有权让渡给科研团队,科研团队获得所有权后自主决策成立企业。张冬表示,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激发了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热情,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速度大大加快。

在安徽,科研人员“带着成果创业”渐成常态。

全省 106 家单位试点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模式,累计赋权成果 1109 项,估值 5.6 亿元,成立或入股科技型企业 89 家。

“为进一步推动省属高校院所成果转化,安徽将打造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 2.0 版,对省属高校、科研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分类指导,以‘赋权企业’为重点,抓好跟踪服务和政策支持。”安徽省科技厅副厅长陈龙胜说。

“科技大市场”加速双链奔赴。

针对供需对接不畅、科研人员对商业运作缺乏了解等问题,安徽近年来全力打造“科技大市场”,培养专业化的技术经理人队伍。在芜湖,普立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是因为安徽“科技大市场”芜湖市场技术经理人服务团的牵线搭桥,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对接,成功落地一个年产值超 3 亿元的智能化工项目。

“技术经理人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人物,也是正在成长中的新兴职业,主要任务是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通过挖掘、培育、熟化、评价、交易、推广成果,有效解决从实验室到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成果定价难’、供需匹配不精准等问题,唤醒‘沉睡’的科技成果。”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陈林介绍,安徽“科技大市场”已培养技术经理人 3300 余人,有效推动一批又一批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此次科交会上,15 家发起单位共同为全国科技大市场联盟揭牌。全国科技大市场联盟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他们将致力于推动跨区域科创资源互通互享、科创服务联动发展,共同助力科技成果“破茧成蝶”,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强劲动能。

金融“活水”持续浇灌创新“沃土”。

“以前科研经费‘撒胡椒面’,现在集中力量攻‘卡脖子’!”据安徽省科技厅介绍,安徽率先实施科技攻关“零基预算”改革,单个项目支持力度平均提升 4.7 倍。2024 年企业牵头和参与的省级科技攻关项目数量和资金占比均达到 80%以上,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安徽构建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基金丛林”,其中省科技厅管理的天使基金群累计设立子基金 39 只,投资金额超 30 亿元。扩面实施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惠及企业 1.2

万家。

无人驾驶观光车自动避障,无人售卖车招手即停,无人清扫车精准收集垃圾……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科研人员参与创立的安徽中科星驰公司,专注于自动驾驶技术,把融资资金用于高阶智能驾驶技术平台的迭代升级、特定场景智能驾驶产品的研发等方面。“自动驾驶技术的产业化成功需要耐心与雄心,安徽的创新生态给了我们信心。”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安徽中科星驰公司联合创始人王智灵说。

数据印证“聚变”:2024 年,安徽高新技术企业达 2.3 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3.5 万家,数量均居全国第一方阵。企业研发投入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对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的贡献率超 80%。

乘势而上,逐新向优“往前赶”

在中国,每三台冰箱、每四台洗衣机、每五台空调就有一台“安徽造”,每出口四辆汽车就有一辆“安徽造”……如今,创新驱动培育下的安徽新质生产力,在海内外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安徽正脚步不停、持续发力。

本届科交会上,一批新的创新成果加速对接市场。西安中科阿尔法公司的车规级传感器芯片项目,经过安徽“科技大市场”的技术经理人燕飞“牵线”,与蚌埠市经开区“两情相悦”,目前项目已意向签约。

“这款芯片可用于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多方面性能,我们正在推进后续工作,加快让成果转化落地,同时也增强安徽的汽车产业竞争力。”燕飞说。

放眼江淮之间,传统产业的焕新未来可期,新兴产业的动能加速奔涌,未来产业的脉动日益强劲。

国盾密语、国盾密邮、国盾密盘、量子安全会议平板一体机……作为国内目前唯一一家量子科技上市公司,科大国盾携多款新产品亮相本届科交会。

就在科大国盾所在的合肥高新区,一条几百米长的马路被几十家量子企业簇拥,被称为“量子大街”。从“量子大街”发端,向南再发展出一个量子产业园,汇聚中电信量子、国盾量子、本源量子、国仪量子等代表性企业,涵盖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全领域,形成我国的量子领域头部产业集群。

离“量子大街”不远的科大硅谷,作为安徽省集聚全球科技创新要素、打造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高产田”,建设两年多来,片区累计新增科技型企业超2500家,培育瞪羚企业140家,新增培育上市公司3家,集聚各类创新创业人才超7万名,集聚各类基金200多只,总规模超2000亿元。科大硅谷以合肥市1%的建成区面积新增了23%的科技型企业,成为全省乃至长三角地区科技型企业聚集地之一。

“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正渐行渐近。

2024年,安徽经济总量迈上5万亿元台阶,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2025年一季度,安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265亿元,同比增长6.2%。

安徽省委曾提出,要实现“经济总量在全国往前赶、经济增速在长三角地区往前赶、各省辖市经济总量在全国往前赶”的三个“往前赶”目标。这片曾以农业、矿业等为代表性产业,靠要素驱动支撑作为发展方式的省份,如今下好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时落子如飞,不断攀高,迈向创新驱动新时代。

今天的安徽,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安徽将乘势而上,扎实推进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来产业培育壮大两大工程,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作者:徐海涛、陈诺;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25年5月)

常住人口超千万—— 合肥持续增强吸引人才磁场效应

日前,安徽省统计局发布2024年安徽省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显示,合肥市常住人口达1000.2万人,成为全国第18座千万人口城市。

具体来看,2021年合肥市常住人口增长9.5万人,2022年增长16.9万人,2023年增长21.9万

人,2024年增长14.9万人。过去4年,合肥人口增长态势显著,城市吸引力不断增强。

在合肥综合性科学中心数据空间研究院,记者看到白色办公桌整齐排列,科研人员正聚精会神查阅文献、编写代码。“这里近一半是外地人。我自己是青海人,博士毕业后就来到这里做数据要素标准建设等方面工作。”研究员滕越说。

滕越坦言,在选择定居城市时,“北上广深”虽有优势,但生活压力较大,而合肥压力相对较小,且有与自己研究领域对口的工作岗位,从生活和事业综合考虑,合肥的“性价比”很高。记者发现,许多像滕越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合肥人”,都是因寻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而定居于此。

近年来,合肥市通过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升级,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综合实力的提升,带动了就业岗位需求不断释放。今年年初,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合肥摸排重点用人单位意向,组建13个工作专班,赴北京、上海、西安等14座城市36所重点高校主动招揽人才。围绕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合肥市坚持招大引强,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产业能级,带动就业岗位持续扩容。在显示产业领域,合肥已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180余家,从业人员近4万人。

合肥市委人才工作局人才服务处处长周燕介绍,近年来合肥市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从2014年的5158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13507.7亿元。在经济增长中发展产业,在发展产业中推动稳定就业,着力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张同频共振。这既提振了人才对合肥发展的信心,又切实为人才提供了工作岗位。

2024年合肥市迁移净增长人口13.1万人,占净增常住人口87.9%。“人口增长靠人才流入,而人才流入需要良好的人才服务。”周燕说。

“好扎根,才能好来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童佩对此深有体会。作为抗体药物以及疫苗研究领域研究员,当地政府做完人才定级后,给予他200万元安家费。同时,提供人才公寓供其居住,配合约4000元租房补贴,足以完全覆盖租住成本。

童佩表示,良好的工作环境对科研人员也极具吸引力。合肥科研资源丰富,周边同行众多,科研氛围浓厚。此外,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研究院会

组织产业方面的专题培训,并依托平台积极搭建对接企业,这填补了青年科研人员对产学研认识的短板,有助于科研成果加快转化落地。

从提供物质条件到营造良好氛围,一系列组合拳让合肥对人才的“磁场效应”持续增强。2024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发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策源作用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的实施方案》,不仅在科技创新方面作出了加快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前沿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强化应用场景示范等部署,还着重强调了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滕越所在单位专门成立了人才发展中心,点对点评估不同人才申请的人才政策,让科研人员能够专心从事科研工作。

据了解,安徽省2023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共48.46万人,超过71%的毕业生在省内就业。在省内就业的毕业生中,38.88%选择了合肥。合肥市已出台《合肥市服务人才发展若干政策》,重点围绕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高校毕业生关心关切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分类分层制定服务保障举措。同时,在皖事通APP上线运行“合肥人才码”,线上实现落户安居、交通出行、政策兑现等近50项优质人才服务“一码通享”,累计提供服务超22万人次。

(作者:李思隐;来源:《经济日报》2025年4月)

安徽合肥建设新一代算力集群—— 算力集群助力前沿技术加速推广

算力是什么?对你我生活有什么影响?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力的飞速发展正推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推广,进而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

近年来,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安徽合肥瞄准需求、抢抓机遇,建设了包含我国首个国产万卡算力集群的新一代算力集群,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开软件,说出指令,不到5秒,一个初具逻辑的文本随即生成。

不单是文本生成,知识问答、逻辑推理、音视频制作……人工智能大模型因其丰富且便捷的功

能,已成为不少人工作生活的好助手。

现今人工智能越来越“智慧”的背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算力在支撑。

何为算力?顾名思义,就是计算能力,即设备单位时间可处理的信息数据量。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算力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加工、处理,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算力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又将如何影响你我日常的工作生活?近日,记者走进安徽合肥“巢湖明月”新一代算力集群,与建设运营团队在一个个巨型机房里寻找答案。

快速完成海量计算,如何做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化学家”实验室里,一种新型研究模式让人眼前一亮:这里没有忙前忙后的科研人员,只有一台动作灵活的机器人在操作台之间来回穿梭。

借助它,中科大江俊教授团队仅用5个星期,就从55万种金属配比中找出最优高熵催化剂。而这一过程需要阅读1.6万篇论文、进行2万组理论计算、分析200组全流程机器实验数据。

如此大的计算量是怎样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呢?答案藏在不远处的合肥先进计算中心。

来到合肥先进计算中心,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大的淡蓝色立方体。玻璃立方内,一台名为“巢湖明月”的超级计算机占据着上下4层共计200多平方米的空间。

“这台计算机光服务器就有1500多台,它的计算能力达到了12P,即每秒钟的运算能力为1.2亿亿次。”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多元算力服务中心主任张云蕾介绍,“全国14亿多人,每人每秒做一次计算,需要将近100天才能做完1.2亿亿次,而我们这台计算机1秒就能完成。”

“有了这台计算机的支持,我们的‘机器化学家’就拥有了‘超强化学大脑’。”江俊一脸自豪,“它能不知疲倦地执行计算任务,得到最优的实验配方。”

不只是科研领域,当下,算力已经和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无论是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合肥都对算力展现出迫切需求。

瞄准这一需求,合肥积极开辟算力新赛道。2021年6月,“巢湖明月”超级计算机正式对外服务。2023年,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超

前布局,建设了 100P 级的算力中心,紧接着又与科大讯飞共同建设了 3000P 级国产万卡算力集群。

“去年,我们又在算力集群上部署了 3 台量子计算机,探索建立起全国首个量超融合计算中心。”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屠冉介绍,眼下,“巢湖明月”新一代算力集群初具雏形。

走全国产技术路线,怎么攻坚?

在中国超级计算机发展史上,有一段受制于人的经历: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从海外高价购置了一台超级计算机,但在使用时却处处受限——为了防止技术泄露,外方要求把设备放在一间全透明的玻璃房里,并控制着机房钥匙和开机密码,我国科学家要经过授权才能进入,且所有操作必须在外方人员的监控下进行。

“‘巢湖明月’玻璃立方的外观设计,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屠冉告诉记者,最初布局算力集群时,在技术上有两条路线可选:一条是采用非国产芯片,这在当时是技术主流;另一条是走全国产路线。“高新技术是讨不来、要不来的。我们团队经过反复调研分析,最终认定,必须建立自主可控的算力体系,走国产化这条‘难而正确’的路。”

国产化的道路难在哪?首先是接受度问题。屠冉坦言,当时,各类科研团队、客户企业对进口芯片搭建起的算力体系已经形成使用习惯,加之国产算力芯片的性能跟前者相比仍有差距,一开始大家都不太愿意用。其次是技术难度大。想要建设 3000P 级全国产万卡算力集群,国内尚无成熟经验可借鉴。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2023 年 7 月,我们同科大讯飞、华为组建起数百人的联合攻关团队,并把工作计划安排精确到天,实行日报日清制度。”联合攻关团队技术负责人潘青华回忆,组网过程中,单是光纤就有 3.5 万多根。网络怎么排布?连接后能否跑通?……每一步,对于团队而言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机房改造、设备部署、光纤接入……经过 107 个昼夜的奋斗,2023 年 10 月,我国首个国产万卡算力集群跑通!张云蕾回忆:“集群点亮的那一刻,不少团队成员流下激动的泪水。”

随后,团队又加紧训练,在 2024 年 1 月,国产

算力集群性能达到当时同类型进口算力集群的 90%。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井梅生介绍,算力集群自运营以来,平均负载率稳定在 84.59%,峰值负载率达到 91.53%,基本处于饱和运行状态,服务质量得到用户好评。

统筹调度算力资源,效率多高?

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工作人员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模拟汽车碰撞,分析高速碰撞时各个零部件以及假人损伤情况。

这样的试验过去主要依赖实车碰撞,周期比较长。现在依托算力集群先进行仿真实验分析,得到大量相关数据后,再进行实车碰撞验证,相关环节研发周期缩短了 30% 以上,显著提高了研发效率。

从工业生产到科研探索,算力之所以成为新质生产力,在于它能够赋能千行百业。

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环境监测……驻足“巢湖明月”新一代算力集群展厅,一项项算力赋能产业发展案例令人目不暇接,一个个模拟应用场景及研发产品令人印象深刻。

据了解,自 2021 年 6 月对外服务以来,“巢湖明月”新一代算力集群积极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民生政务等领域,已累计服务 700 多家科研院所、近 6000 个用户,累计交付超 34.7 亿核时的 CPU 算力、1.56 亿卡时的人工智能算力,保障计算任务超 1000 万次。

“如今通过与国家超算互联网连接,我们还能调度来自江苏、浙江、上海、四川等 14 个省份 20 多家超算和智算中心的算力。”屠冉介绍,去年 6 月,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需要峰值约 1 万核的计算资源,“如果用本地的算力,就要排队等待一个月。我们通过平台调度了外地的算力资源,有效保障任务按时完成。”

今年以来,合肥全力打造国产算力生态高地,升级发布了城市算力池计划,进一步集聚各地国产算力资源。目前,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直接纳管的算力已近 2 万 P。

夜幕降临,“巢湖明月”机房里的指示灯还在不停闪烁。玻璃立方亮起,科技创新的步伐继续前行。

(作者:李俊杰、孙佩瑾;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4 月)

“花”为媒释放文旅消费潜能

春花竞放时节,各地以花为媒,推出“赏花+人文”“赏花+餐饮”“赏花+产业”等多种旅游体验模式,有效放大“赏花经济”吸引力。

做活“花”文章

走进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天府农博园,大片的彩色油菜花迎来盛花期。农博园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农业科研机构试种的新品种,出油率高且花期长达百天。双休日前来赏花打卡的游客有5万人次,平时也有1万人次至2万人次。

在雅安市汉源县九襄镇三强村,梨花、李子花竞相绽放,游客赶来踏青。来自成都的游客李小宁说,这已是他和家人第4次到此赏花了。

随着气温回升,江淮大地上油菜花竞相绽放。在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罗家疃村,游客在田野打卡拍照。合肥市民张婷婷趁着晴好天气自驾前来,“欣赏美景让人心旷神怡,我们还计划去巢湖拍日落,再去古镇品尝美食”。

每年3月份至4月份,樱花在江苏省无锡太湖鼋头渚风景区接连盛放,开启一年一度的“赏樱季”。

“我们在樱花谷设置了4个网红打卡点,还增添了汉服互动场景。”无锡太湖鼋头渚风景区相关负责人朱俊介绍,樱花谷内设有漫画小巷,可以现场画漫画;汉服妆造馆也已开门营业,前来预订拍摄的游客络绎不绝。在樱花主题场景下,樱花雪糕、樱花风铃、樱花伴手礼等文创产品推陈出新,深受游客喜爱。

为了给游客更好的观赏效果,成都开辟了多条“空中赏花”线路,游客可搭固定翼飞机饱览无尽花海;汉源县已连续举办12届赏花促消费活动,包括梨花音乐汇、梨花仙子主题巡游、黄牛肉宴、湖鲜宴等活动。

3月初,无锡迎来了中国对韩免签政策试行后首个韩国国际游轮团。组织此游轮团的无锡国旅国际交流部总经理金星淑介绍,今年的目标是组织超过2000名韩国游客通过游轮航线来到无锡旅游。近期,2025无锡“国际月”暨国际赏樱周活动如期而至,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朋旧友共赏春光、共促合作,将无锡“樱花季”推向高潮。相关数据显示,前2个月,入境游客量(含港澳台)同比增长35.8%。

带动乡村游

大量游客到乡村观景游玩、打卡拍照,也为乡村文旅带来了新机遇。记者走进肥东花朝季·鲜花小院民宿,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油菜花挺立在老旧铁轨旁。两旁的院子中,以类徽派风格的江淮民居为主体,搭配上精心规划的主题花园,显得新颖别致。

“赏花可以带来流量,但体验才能带来收益。”该民宿副总经理陈彦介绍,根据季节变化,小院以不同花卉元素为主题,开展亲子教育、休闲手作课程、聚会派对等活动,带动花卉与延伸产品销售,着力打造别具特色的花园民宿体验中心。

在三强村,许多村民收拾好自家庭院搞起了农家乐。村民陈英的烧烤摊格外火爆。“高峰时期,一天可以卖出四五千串烤串。”陈英高兴地说。

紧抓赏花热潮,乡村民宿正不断将赏花“流量”变文旅“存量”。肥东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晓军表示,近年来,当地着力将旅游民宿作为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加快构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政策激励、联农带农、长效发展”的旅游民宿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全县建成运营旅游民宿26家、在建旅游民宿3家,民宿整体实现了量质齐升。

为了拓展赏花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南京市江宁区打造了全新文旅IP——“苏花路”,并量身定制了配套旅游直通车,通过串联江宁区银杏湖、乡伴苏家、龙乡双范、黄龙岙、花塘村等12个知名乡村旅游点和60多家乡村民宿,打响“乡约来苏六十里,看遍金陵十二花”的山水经济品牌。这条线路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多元游、深度游为主,无论是特色产品还是主题路线,都与“村景”相连,不仅能赏花,还满足了市民品特色美食、赏风土人情的消费需求。

拉长产业链

近日,无锡出台《无锡市繁荣文化旅游业若干政策措施》,从扩大特色优质产品供给、丰富消费惠民举措、优化文旅产业生态等多个维度入手,着力将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

新沂市是江苏鲜切花生产和出口创汇重要基地,年产鲜切花1.2亿枝。“经过流水线作业,一束束鲜切花装进集装箱发到连云港口岸,通过水路,最快16个小时就能摆上日本、韩国的花市。”新沂市高流镇辉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岳增

辉说。

走进新沂市高流镇梅花加工厂,工人正在将采摘下来的新鲜梅花进行筛选、烘干,制作成清香怡人的梅花茶。为了将梅花产品推广到更远的地方,高流镇积极组织农户参与电商销售。现在正是梅花和梅花产品销售旺季,电商主播李紫琦介绍,高流镇培育了100多个梅花品种,从二三十元的普通花苗到几千元的珍稀品种应有尽有,带动500多户农户增收。

记者从新沂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当地已经开发出花茶、花饼和护肤品等食品和功能性的产品,能吃、能喝、能做化妆品的“三朵花”年产值已达到15亿元,增加就业岗位1万多个。“风景”变“钱景”,“颜值”变“产值”,赏花经济激活了文旅市场

消费潜力。

(作者:薛海燕、钟华林、蒋波、李思隐;来源:《经济日报》2025年4月)

本栏目供稿、责任编辑:黄宁平

启 事

本栏目属转载文章,因客观原因未及与作者提前沟通,请作者看到本启事后,与本刊编辑部联系(电话:0551-62206629),编辑部将按本刊相关制度向作者支付稿酬。

(上接第29页)

- [3] 侯翠梅,苏杭.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现状与路径研究[J].人民论坛,2023(12):95-97.
- [4] 高伟,姚冰洋.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大学生返乡创业的逻辑进路[J].农业经济,2022(7):114-116.
- [5] 辛德万.乡村振兴战略下大学生返乡创业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3(10):127-129.
- [6] 苏海泉,武书宁,乔松.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现状分析及社会支持构建——以辽宁省101个县区862名创业者调研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7(6):12-16.
- [7] 段彩丽,焦伟伟,范彬.大学生返乡创业倾向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J].调研世界,2016(7):27-32.
- [8] 顾辉.政府角色定位、政策机制与返乡大学生成功创业[J].湖南社会科学,2021(1):87-95.

- [9] 高伟,李丹.破解农村大学生返乡创业“最后一公里”问题的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3(4):119-122.
- [10] SMITH T B.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J]. Policy Sciences,1973(2):197-209.
- [11] 刘洪银.构建人才返乡下乡的有效机制论析[J].中州学刊,2021(4):34-40.
- [12] 孙长良.我国中考体育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视角[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4(1):44-49.
- [13] 钱再见.影响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深层机制探究[J].理论与改革,2001(5):15-17.
- [14] 陈振明,吴勇锋.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实践优势与制度逻辑[J].科学社会主义,2021(4):113-118.

责任编辑:徐书琴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明德

中石書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 62206658 62206629
电子邮箱：XB1233@126.com

印 刷：合肥新南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自办发行
定 价：5.00元

